

何谓中日战争？

(日) 纘纘厚 著 申荷丽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书作者认为：昭和天皇所持有的中国观以及对中日战争的错误判断，同样也引发了对英美的战争。在与英美开战前后，由于长期与中国作战，加大了对作为战争资源或者军需基地的中国台湾、朝鲜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扩充了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的军事占领和统治。由此，本书意在通过以中日战争为媒介，就有关日本人对中国开战的意图以至所导致的结果，重新加以探讨和评价。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8823-7



9 787100 088237 >

定价：20.00元

何谓中日战争？

[日] 額瀨厚◎著 申荷丽◎译

商務印書館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中日战争? / (日) 纘纘厚著; 申荷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8823 - 7

I. ①何… II. ①纘… ②申… III. ①日本—侵华—历史—研究 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906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何谓中日战争？

[日] 纘纘厚 著

申荷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823 - 7

2012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3/8

定价: 20.00元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001

第一章 访问现代中国 / 013

第二章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 052

第三章 日本“战败”是败给了谁？ / 126

第四章 日本是“败给”中国、“投降”于美国吗？ / 186

主要参考文献 / 246

后记 / 255

追记 / 261

前言

昭和天皇的话

最近，昭和天皇留下来的证言录相继被公布。2007年3月9日公布的原侍从小仓库次的日记则是其一。小仓侍奉在天皇的左右，可以说其直接的心声详尽地记录于日记中。

在该日记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昭和天皇的中日战争观。例如，1940年（昭和十五年）10月12日的一篇中，写有如下的昭和天皇之所言：

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连专长的陆军竟也观察有误。由此，今日各方面都有反响。（“‘小仓库次侍从日记’昭和天皇战时真言”，《文艺春秋》2007年4月特别号）

对此，现代史学家佐半藤一利附加了这样的解说：这体现了昭和天皇对深陷泥沼之中的中日战争的悔悟之意，表达了对当初陆军乐观预测的强烈不满。

不过，我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这句话。在陆军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时，昭和天皇应允了陆军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进言。由此，在开战之初，对战而必胜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在卢沟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事件发生（1937年7月7日）的翌日，情况即转达于天皇。在当时，抱有“中国懦弱”之认识的军官们在陆军省以及总参谋部的

中枢部门掌握着实权。

他们持有乐观的论调，认为只要给中国一击，从华北地一带到内蒙古地区就应该归于日军。（《河边虎四郎回忆录·从市之谷到市之谷》，每日新闻社1979年版）

昭和天皇最终不是与他们也持有相同的判断吗？昭和天皇自己也低估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或者说中国自身的力量，我认为这从上述言谈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我对这一证言尤为关注，是因为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昭和天皇、陆军以及日本政府，可能也是当时所有日本人共同持有的对中国的认识。

在翌年（1941年，昭和十六年）1月9日记载的证言中，吐露了因低估中国的懊悔之言：“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10年增强国力。”

在这里，“轻视了支那”的主语是“日本”，这同时不就是意指昭和天皇自身吗？另外，这也许是对自己错误地估计中国所表现出的焦躁，以及对错误地禀报信息

的陆军所显示出的不满。再进一步想象的话，可以说在对英美战争开始的前一年，昭和天皇就已有预感，认定对中国之战终究会战败。

接下来，以下几处也值得注意。这是对英美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即1942年（昭和十七年）12月11日记录的事项。

昭和天皇出行京都之际，对小仓等身边侍从说：“我不想发动支那事变，因为苏维埃令人畏惧，并且，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战争开始的话，支那不是那么容易地被击败，不会像九一八事变那样。”言外之意好像显露出意识到战败的心境。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只经过3年多昭和天皇就预料到了胜败归属。为准备对苏联作战，把中国当成了确保资源供给或者攻击苏联的军事基地，而没有制定压制中国的目标，这种沮丧的情绪不加隐瞒地流露了出来。

实际上，正如昭和天皇所预见的，对中国的战争

已陷入泥沼。为打破这一难堪局面，导致了1941年12月8日决意对英美开战这一历史事实。这一决断可谓“愚蠢的行为”。

之所以断定其为“愚蠢的行为”，有必要加以说明。既然昭和天皇能够预料到战争必将失败，那么为何还不停止对英美的战争呢？这也是一大问题。

加之，昭和天皇认为对中国之战是危险的、没有获胜的希望，对小仓库次侍从所言的这些思虑，为什么没有向周围其他人直接传达呢？

不难想象，以昭和天皇的地位来看，对此确有难言之隐。昭和天皇自身尊重立宪主义的立场，即使陷于这种艰难境遇，难道作为专制君主想要逃避战争责任吗？或者这还是天皇自身的决断力不足所促成的结果呢？

对此的回答是不同的。但是我认为卷入了中日战争的日本，已经身陷战争这一巨大洪流之中而一筹莫展，并且，包括天皇在内谁也没有能力阻止这一战争

洪流。一旦卷入战争，要想中途停止是极其困难的。这是选择了战争的状态。

因此，在本书中特别想要提出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之初，即便是能够接触到各方面情报的昭和天皇，对于中日之战也持有乐观的看法。当时这种大多数日本人持有的这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中国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

正因为当初对中日之战持乐观态度，在昭和天皇的言谈中所显示出的困惑以及意外的失望等情绪才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

那么，这里不禁要问，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事实上，如果不从正面来看这一问题，我想也就不能够解答何谓中日战争这一问题，这也是贯穿本书的重要课题。

另外，在此所说的对中国的认识，即使在今日也未必能够澄清。日本政府或者日本人的对外认识往往是抱有主观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将过去的认识倾向

不断地继承延续下来。

也就是说，对不可能实现的问题，仅仅根据自身的便利急于作出判断，缺乏耐心的交涉和对话精神。

我一直在思考，如果不正视日本人持有的对中国的认识这一问题，要把握中日战争的原因，以及评价这场无谓的战争，都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引发卢沟桥事变的原因、1930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以及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重新加以探讨和评价。因此，在本书前半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此进行了论述。

重看中日战争

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如今的日本人也以多种形式继承了战前日本人以对中国认识为代表的对整个亚洲的认识。为了消除其中蕴含的偏见和误解等，有必

要重新评价中日战争。

我认为昭和天皇所持有的中国观以及对中日战争的错误判断，同样也引发了对英美的战争。在与英美开战前后，由于长期与中国作战，加大了对作为战争资源或者军需基地的中国台湾、朝鲜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扩充了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的军事占领和统治。

由此，本书意在通过以中日战争为媒介，就有关日本人对中国开战的意图以至所导致的结果，重新加以探讨和评价。

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后，日本在对英美战争中第一次品尝到战败的滋味。在此次战败之前，从历史的年代代表来看，战争的历史可谓连绵不断。

也就是以出兵台湾（1874年）为开端，甲午战争（1894—1895年，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1904—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等一系列对外战争不断上演。其中，

还强行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5年）。

此外，还有涉及义和团事件的出兵北京（1900年），济南事件（1928年）以及出兵山东（1927—1928年）等。

以上这些战争及出兵几乎都是以中国为对象的。以这些战争及出兵为跳板，战前的日本膨胀和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战败，通过实力发展的逻辑遭到失败。

由此，有必要在追溯这些历史过程的同时，来努力加深理解所谓战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书同时将中日两国政府以及国民看待历史的不同方式和思维观念作为中心题目来加以论述。

为了确认历史事实，需要一定的客观根据，同时又涉及如何看待历史事实的态度这一棘手的问题。

即使是从第三者的立场看待历史事实，当关系到个人的生存价值和存在时，也会出于自身的考虑而避开，这样的情况好像并不少见。无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程度如何，由于不愿去加深历史认识，也就不能从历史事实

中汲取教训，或者有时根本不想从中汲取教训。

所谓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我认为两者应该是表里一体的。同时，又是关系到自身存在去考虑和把握的问题。

本书再次提出“何谓中日战争”，正是为了通过历史的回顾，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思索。

过去以至今日摆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依然阻碍着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我认为其根本在于有关中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课题还未得到解决。中日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以中日战争为事端引发的。

自出兵台湾开始，经过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事实上两国进入战争状态，进而由于卢沟桥事件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由此演绎而来的中日战争到底是怎样一场战争呢？对此加以探讨具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作为步入了现代国家的日本，应该对这场战

争不断地进行检讨和反思。

应在各个领域进行对战争的这种检讨和反思。但是，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这场值得反省的战争中，日本究竟是跟谁的战争？败给了谁？确定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且根据现在的观点去加以认识，持有这样一种姿态是极其重要的。

本书后半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阐述了我个人对有关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索。其中也包括这一感触和认识：日本战败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发动的一切战争的“战败”。

近代日本所孕育的国家体制以及国民的对外认识，特别是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事实上潜藏了支持发动战争这一国家暴力的原因。可以说，战争的原因和失败即归结于这样的对外认识，尤其是在认识方面对中国持有的偏见和误解。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主题。

另外，首先想要明确的是，通常所谓的中日战争，是指自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直至日本战败为止的战争，

又将其特指为“中日十五年战争”。但是，本书中所指的，是从出兵台湾开始一直到日本战败为止、连续不断的中日之间的战争。

当然，本书主要还是以“中日十五年战争”为主要对象加以探讨，但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日本以及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因而广泛地设定了这一战争期间。

第一章

访问现代中国

一、交叉的过去和现在

面对历史的原点

这是距今大约 20 年前的事情。1986 年 8 月至 9 月间，我去中国旅行。

先是到了北京，之后又去了武汉、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此次旅行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参观当年开馆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名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同时参观在南京市内 13 个



刚刚开馆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笔者摄于1986年9月4日）

场所建立的屠杀纪念碑。我希望能够了解碑上所刻录的碑文的内容。

纪念碑各具特色，风格各异，当时惨遭杀害的中国死难者人数等都详细地镌刻在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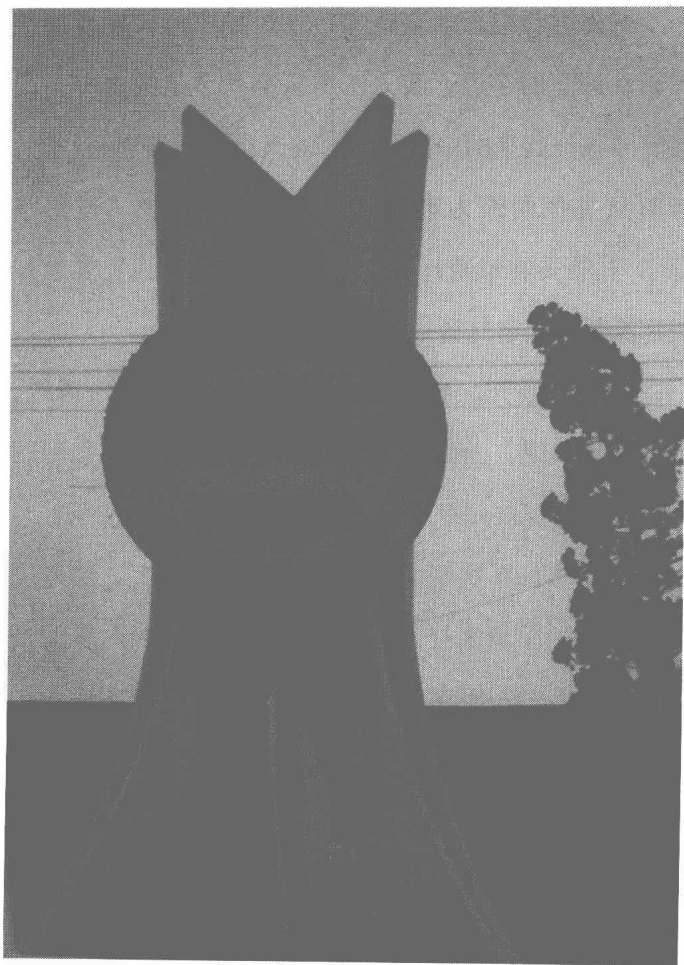
其中有件事情至今深刻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那是去参观长江沿岸名叫下关的停船场附近的纪念碑时，在其碑前所发生的事情。

当我对着纪念碑调整焦距想要拍照时，发现碑上有胡乱涂写的字迹。我无法辨认那些字迹的内容，就向陪同我一起来的中国外交部的人员询问写的是什么。当时只见他面带为难的表情，边摆手边说“不用了吧”，礼貌委婉地避开了。这么一来，我反而更加想知道那涂写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我便又向另一位年轻的翻译请教，他向我解释说，上面写的是：“就是建造了这么壮观的纪念碑，我那被日军残害的丈夫也不能死而复生啊。”

将侵华日军残暴的记忆留存在纪念碑上，遗属以涂写内心的感慨来抒发无法忍受的悲痛。当时外交部的人员对我的提问避而未答，也许是顾虑到我能否理解这一行为。

建造纪念碑的形式与把历史事实作为文献和资料留存于后世有所不同，高近3米、用混凝土建造的纪念碑矗立在人们能够看到的地方，使人们总是不断地目睹历史事实，感受那段悲痛的回忆。回想起来，当时我站在



南京下关纪念碑（笔者摄于1986年9月7日）

碑前，自己内心也充满了极其复杂的情感。

虽然赞同建立纪念碑的意义，但是触景生情，由此也就触发了那位遗属不由自主地抒发深藏于内心的悲哀吧。每当我在面对和讲述过去那场战争的历史时，纪念碑前的经历以及那位妇女抒发的悲伤和感慨总是会浮现于我的脑海。这一体验，成为我论述中日关系史的原点。

在日本和中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中，两国之间与“战争”相关联的时期毕竟是短暂的。但是，那场为时不算太长的中日战争残虐了大量的中国人，而由此遗留下无数的遗属，就像在纪念碑上抒发悲伤和感慨的妇女一样，战争留给人们内心的创伤是难以抚平的。那场悲痛的战争史，即使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也如同针刺般深深地刺痛着内心。

中日战争使中日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了，直到1972年9月29日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对两国来说无疑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带了来新的转机。

中国现在持续迅速的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妥善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对日本来说，则希望中国增加在韩国和东亚方面的市场，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石。

在政治方面，日本也从跟随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不断加强和重视对中关系，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进一步促进了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和发展。

中日关系方面，一直流行着“政冷经热”之说。目前似乎正逐步从这种沉重的气氛中解脱出来。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那场战争留下的刺一直被搁置了下来。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由于搁置的时间过于长久，那种刺痛的感觉已经淡漠了，在思想意识上对此针刺的史实也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我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由此曾阅读参考了大量的有关文献和史料。但是，我面对的不仅仅是这

些文献和史料，我一直在思索，永远都不能忘却那些在中日关系史上被捉弄和被迫牺牲的人，尤其是卷入中日战争被残酷杀害的无辜人民。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心情和思索也许就是在南京下关纪念碑前的体验触发产生的。虽然自己意识到在叙述历史时掺杂个人体验和感情要素是晦涩和危险的，但又深深感到对于此次历史叙述来说又是极其必要的。

换句话说，历史是通过人的感情来记录，从而也被记忆下来的。那么，如果不能正视那些被历史捉弄的人的感情的话，也就不可能正视历史。

在卢沟桥边

2003年9月，为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国际研讨会，时隔很久，我再次访问了北京。当时已经确定北京将主办2008年奥运会，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着大的改造。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一定

呈现出更加崭新的面貌。

我坐在出租车上，望着车窗外砖瓦构造的街边房屋一片片地被拆除的景象，车在因施工导致的凹凸不平的道路上颠簸行驶，朝着架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驶去。大约 70 年前，这座桥成为了中日两军展开军事冲突的现场。那是 1937 年（昭和十二年）7 月 7 日。日本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卢沟桥事件，中国则称其为七七事变。

我抵达卢沟桥时，看到永定河的水已经干涸了，河中杂草丛生。草丛中静静地停放着几艘游览用的小船。此景给人一种宛如时间停止的错觉。

卢沟桥两侧雕刻着具有不同形象的石狮，间隔相等地矗立着，极其美观。在这座美丽的石桥上展开的枪战，之后被视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的开端，这是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吧。

卢沟桥事件发生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夜间，驻扎在北平（现在的北京）西南部丰台的日军步兵第一联队

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永定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由“从中国军队阵地的某个方向射来实弹”为事件的起因。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清楚。

是谁、又是为何目的而发射实弹的呢？至今依然有诸多说法。

已经明确的是，依据这一来路不明的飞弹为理由，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从而，围绕事件处理，中日两军开始交涉，以至日军中枢围绕事件处理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对立。

而由此引发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来路不明的枪弹最终发展成为中日全面战争。

在此有必要提出两点疑问。一个是，来路不明的枪弹没有造成伤害，但为什么日军要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呢？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日军驻扎在中国的首都^[1]近郊，并伺机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呢？此问题虽单纯，

[1] 此处作者理解有误，北平当时并非首都，当时的首都在南京。——编者

却意义重大。

战后日本近代史研究面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认真探讨。不仅是历史研究者，许多日本人也曾对此抱有极大的关心。虽然把握问题的视点与日本有所不同，但在中国，它也同样引人关注。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对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淡漠了。而中国虽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作为“爱国教育”的一环，特别加强了历史教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也同样变得模糊了。尤其是中日两国的青年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这么思索着，在石桥上来来回回地踱步。在道路施工、建筑拆除的喧闹声中，只有这座石桥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好像在努力地向后世如实地诉说着 70 年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站在卢沟桥上看着业已干涸的永定河，我再一次问自己，究竟何谓中日战争？并试图寻求解答，甚至萌发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在永定河的水开始流动

之前要找出答案。

在卢沟桥上两军发起冲突，宣告了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可以说，早在此之前，日方就已有所预谋和策划准备了。

近代日本在同欧美列强的竞争中，果敢地加入了对近邻中国进行资源与市场的争夺。为此而保持了强大的军队，大量地增加军事官僚，从而使军事机构逐渐庞大。

在卢沟桥事件中，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在此之前驻扎在中国首都（指北平）近郊，这些行动都是近代日本所持有的侵略思想以及侵略主义决定的。

追溯历史，以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为契机，日本获得了驻军权，事实上，自那时起日本就伺机压制中国。经过几场战争之后，日本驻军以卢沟桥为据点，决定推进和实现压制中国的夙愿。这同时也导致了日本开始步入歧途，走向战败之路。

自卢沟桥事件开始到日本战败为止，当时日本军部指导者以及很多日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呢？对拥有辽阔土地和众多人口的中国抱有怎样的意图呢？日本在与中国的交战中，又是怎样迫不得已地改变的呢？

在回顾日本近代史时，作为日本发展和失败的历史，中日战争正好处在其转折点上。突出军事力量的近代日本发展史，最终以战败告终。对这一历史事实，有必要以现在的观点重新进行评价，再次探讨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

“反日运动”和“爱国教育”

2005年3月到4月间，在中国各地，所谓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令人记忆犹新。据说这一运动是从3月末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学生，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联合签名活动开始的。

如今回顾这场“反日运动”，不禁联想起中日战争前的“五四”运动（1919年）和“五卅”事件（1925年）。

前者是1919年1月18日，以抗议日本政府（当时是大隈重信内阁），要求解除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并要求日本归还大战期间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益等，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凡尔赛和约》之时也未能实现。“五四”运动则是在此背景下北京学生发起的强烈的反日运动。“五卅”事件是针对上海的日本纺织厂施行歧视性劳务管理而引发的一次大众性的反日运动。

自日本对中国不断表现出强硬姿态的明治年间起，这一系列的运动屡有发生。以工人和学生为主体掀起的上述两次“反日运动”，被认为是对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具有极大影响的划时代的事件。

自这两次“反日运动”之后，中国民众的对日情感日趋恶化。从“反日”到“排日”，进而到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逐步上升到“抗日”。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以

后，在“抗日”的名义下，中国民众投入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

将2005年的“反日运动”与中日战争前的反日运动进行比较，也许应该慎重。但是，一般认为中日战争前培育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所谓历史感情通过某种行动而表现出来。

可是，现在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历史情感无所顾忌、不加体谅。比如，有种流行的说法是，此次事件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由于惊人的经济发展加大了贫富差距，一部分对此怀有不满和积怨的人受到煽动而掀起了“反日”游行。说这是为了搁置中国国内的诸多矛盾，中国政府策划的“官制游行”。

也有日本媒体以及许多所谓的知识界和评论界人士发表看法，他们批评说，中国的“反日暴动”是中国人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推行的所谓“爱国教育”的结果。

“爱国教育”是中国政府为唤起中国人民的国家意

识而实施的一大政策，通过展示和学习抗日战争胜利等历史事实，来更好地唤起中国人的新的国家意识。总之，通过不断地加强历史教育统一历史认识，增强中国国民的一体感。

中国和日本一样，都使用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日本称为审定教科书，实质上是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中国教师用的指导书明确了“使学生学习抗日战争英雄们的爱国精神”，达到“爱国教育”的目的。鉴于此，把“爱国教育”和“反日教育”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多少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那么，发生“反日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把“反日运动”或者“反日示威游行”故意作为中国国内问题来考虑将不能充分地把握事态的真相。

在中国，城市青年中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网络社会。青年们通过互联网就广泛多样的话题进行大胆的交流。在经济环境急剧的变化中，自身以及周围的人渐渐变得富裕，这是有目共睹，甚至可以感受到的。

即使国家不进行教育，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和国家意识观念也会自然地不断得到增强。

特别是，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极其密切，如何把握与日本的关系、保持怎样的距离，可以说是中国青年面对的难题。虽然是复杂的问题，但又不能采取暧昧的态度，可能这就是中国青年共同的对日认识。

在此，也可以说是最大悬案的历史问题，由于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关系，一直被搁置了起来。日本、中国都鉴于各自的国内状况，暂且将对历史问题的关心或者追究搁置下来。

中国青年们果断地推开历史问题的大门，要求日本反省侵华历史，希望从被害意识中解放出来。开始达到一定富裕程度的中国人，在重新考虑过去一直优先于一切的与日本和欧美的经济关系。

在这一动向中，对历史问题的关心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是，日本方面只是反复表示口头上的谢罪，却

依然不愿正视历史，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的这种不反省的态度，不满增多也是极其自然的。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不能以明确的态度评价过去的那场战争，对此，中国青年按捺不住愤慨和不满，以这次“反日示威游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中国的年轻人有时指着日本人说“小日本”，我认为这绝不是像过去那样带有污蔑性的感情表现。不过我觉得，在他们结合历史问题而说出“小日本”时，其中感情上总还是隐含有不满以及愤怒的一面吧。也许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认识。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

2007年3月28日，我去了西安市，到西安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访问并作演讲。

当时，我以构筑21世纪东北亚地域的“和平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话题，以及结合欧盟事例，



在西安交通大学演讲（笔者摄于2007年3月30日）

进行了演讲。

演讲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到提问的时候，出现了未曾预料的场面。因为我想坦诚地与中国的教师及学生进行讨论和交流，而讨论的展开出乎我的预料。

在此，就当时提问的情况作一些介绍。提问之一是从东亚全体来看中日关系的未来趋势，这是一个意

义深刻的问题。

提问者是位年轻的教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他说：“对于将来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中心，构筑亚洲版的‘欧盟’，我表示赞同。但是，我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对遗留的历史问题不加以认识的情况下，作为担当基础的国家——日本，能够赢得信赖吗？第二是，如果构成了这一共同体，您认为应该以哪个国家为中心呢？”

这样的提问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问题。以前我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作演讲时，也常常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之后的2007年9月，在位于济南市的山东大学和大连市的辽宁师范大学进行演讲时，会场上也有人提出了几乎与此完全雷同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年轻教师以及学生，好像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当时，那位提问的教师对于我所解释的通过构筑亚洲共同体创造和平区域等观点表示能够充分理解，只是责问日本是否具有这样的资格。同时，其中也包

括提出了战争责任的无时效性以及国际性等比较难的问题。

提问的话语中隐含了对日本方面的期待，希望日方深刻认识战争责任，在推行具体的政策过程中，能够抱有真挚的态度反省和认识过去。

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必须按照前后联系加以回答，当时我是这么讲的。

所谓历史，如同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座桥梁。在任何情况下，支撑这座桥梁的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桥桁都必须始终保持同样的高度，一边高、一边低是绝对不行的。

为了在历史这座桥上行走，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桥桁必须建成同样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日本好像将过去的桥桁建造得太低了。

我们日本人为了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也必须下决心重新建造这两个桥桁。这项工程何时结束尚

不清楚，我认为要不断地作出努力以保持两个桥桁并行，这是对应战争责任无时效性这一课题。

另外，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广为评价和认识的问题，是赢得国际社会信赖的途径。对于这一问题，希望按战争责任的国际性来加以理解。

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哪个国家为中心？我认为这种想法需要转变。的确，由于过去的战败国德国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加之努力反省过去战争的教训，赢得了较高的评价，从而在事实上成为欧盟的中心国。但是，我不认为讨论哪个国家成为中心国会有建设性的意义。

我认为，不是采用中心国的方式，而是采取比如轮流坐庄的方式，轮流担当中心国比较好。最初两年是中国，接下来两年是日本，再往后是韩国，如此轮流坐庄。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构筑了共同体，实际上并不是仅由一国作代表其他国家不去尽力。我认为共同承担和构筑是十分重要的。

即使存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差别，但因为所有的加盟国都是平等的，作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民主主义的场所，应该确立一种和平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中心指导国是中国，是日本，是所有的加盟国。这是当然的原则吧？我认为，如果这样的构筑能够确立和稳固，就不会再出现不幸的历史。

对于回答这样的提问，我个人的习惯做法是，不去就其提问直截了当地回答，而是用稍加委婉的说法予以解释。这次也采取了这种应答方式。

听了这种提问和回答，其他到场的人也接二连三地开始提出新的问题，讨论会气氛热烈，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国的青年们想认真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和现在的心情。我本来打算冷静地回答，结果却引发了热烈的议论，与会师生们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

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我深深感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即使打开了形式上的封闭状态，但如今仍然尚未达到真诚地敞开心怀进行广泛讨论、交流的程度。

当然，未能达到双方之间进行自由广泛的讨论交流，是由于两国存在各自的情况。在此想特别指出的是，即便存在各自的原因，中日两国之间恢复邦交已35年之久，然而两国之间、尤其是两国人民之间的自由讨论交流依然极不充分。

两国之间进行着大量的物资贸易交流，众多的游客访问中国，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超过2万人，从中国来日本的留学生超过9万人。不仅仅是庞大的物资贸易，两国人民之间也进行着大量的交往，如此这般的交往态势，依然缺乏真诚自由的交流沟通，其原因何在呢？

我个人认为，妨碍两国人民自由沟通的最大问题还是历史问题。应该将其作为重要课题，将历史这一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同时作为连接中国和日本的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来重新加以认识。

二、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历史观

两国青年的意识

基于上述认识，我开始考虑以包括日本、中国以及韩国在内的三国青年为对象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探讨三国青年在历史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由于争取到了文部科学省拨付的科研补助经费，很快这一调查计划得以付诸实施。自 2004 年开始着手进行《关于构筑东北亚诸国间信赖关系的展望和课题》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成员不仅有日本人，在大学院学习的中国、韩国的留学生也参加该项调查研究。

这项研究对日本、中国、韩国三国青年学生共计 3090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 13 个项目，在此，仅就其中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有关问答结果作一介绍。

在中国近 10 所大学，向 1257 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答人数为 1252 人）。问卷最想了解的就是，

中日两国的大学生，对中日战争抱有怎样的认识。中国学生认为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达 90.6%。

与此相对，日本学生（参与答卷的人数为 696 人）中，与此相同的回答占 66.5%。从中明显看出两国学生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所存在的差异。

从这一数字可以感受到两国在历史教育方面的差异。同时是否也可以说是“被侵略一方”和“侵略一方”的差异呢。这种数字上的差距使人想到动手打人的一方要理解挨打一方的疼痛是困难的。

接下来，对于“何谓中日战争”这一提问，回答是“无可奈何的战争”的，在日本占 14.8%，与此相比，中国只占 4.5%。认为是“无可奈何的战争”的理由，在调查结果中没有显示。

从这样的回答中，往往可以看出战争不可避免论，甚至也可以说对命运决定论这样的深入思考的回避态度。即使说不上是回避，也可能缺少判断的依据，不能立刻决断。这里，事实上也显示了抱有近似于战争

肯定论的心态。

无论如何，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尤其是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存在的认识上的差异，从中日学生之间所占比率看，具有 24.1% 的差异。这一数字出乎我的意料。

单从日本学生的答卷来看，回答中日战争不是“侵略战争”的日本学生占 33.5%。可以说这一数字表明中日两国青年学生对历史认识存在的差异。

中日两国学生之间在数字上显示的这种历史认识的差异如果不能够填平的话，那么推进历史和解将会是困难的。我认为，在一方认定是侵略战争，而另一方并不能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事实上是无法深入探讨侵略战争的实质的。

如果可能的话，首先中日双方的学生在侵略战争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以此为出发点，同时探讨历史经纬这一共同作业是不可缺少的。涉及历史问题的中日关系，是否可以说依然是在入口处，处于一筹莫展

的状态呢？

有关这一点，我通过与中国学生的交谈也颇有感受。他们反复地说，为什么日本学生不能认识到是侵略战争呢？这令人难以理解。处在能够充分地学习历史事实的环境之中，但为什么不愿接受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呢？这些学生谈论时常常抑制不住激动，表情显得认真而严肃。

在“您知道靖国神社是什么样的神社吗”这一问答中，像这种历史认识上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

日本学生回答最多的是“祭奠战死者的神社”，占64.8%（中国学生占22%）。与此对应，中国学生回答得最多的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占71.3%（日本学生占20.7%）。

两国学生认识上存在明显差距。尽管近七成的日本学生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却有近七成的人将与“侵略战争”密切关联的“靖国神社”仅仅理解为“祭奠战死者”的神社。即使日本学生或者大多

数日本人能够认同，但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为什么日本人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反差？是缺乏认识的一贯性？参与项目的中国学生反复提出这样的质问。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学生将“侵略战争”和“靖国神社”作为表里一体的关系来看待。与此对应，约七成的日本学生认为两者并不一定有关。在他们看来，由于战争是过去的问题，加之战后的历史教育，对回答是“侵略战争”，大多数日本学生并未感到犹豫。

而另一方面，作为现在的问题，即所谓靖国神社问题，对此在意识上缺乏运用历史认识和历史知识来考虑判断。由此可见，中国学生将过去和现在作为一体来把握，对历史认识有深刻的理解。与此对应，日本学生表现为将过去和现在分开来看，存在对历史认识不深入的倾向。

问卷中显示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学生有三成以上连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都不能断定。他们中的多数大概对靖国神社的认识也是持肯定的态度。虽然不会是全部都这么认为的，但可以说他们是将过去和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视为一体化来考虑的。

日本学生约有三成将过去和现在作为一体加以考虑，这事实上表明对侵略战争的批判精神在倒退。中国学生的大多数将过去和现在作为一体来把握，表现出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事实上作为肯定侵略战争装置的靖国神社进行批判的姿态。

两国学生对包括上述内容的在历史观念上的差距，是怎样产生的呢？

产生历史认识偏差的原因

如前所述，针对以中国青年学生为主进行的“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有日本媒体和舆论指责是因为

开展了敌视日本的“反日教育”，究竟是否如此呢？在此所说的“反日教育”，大概是指1995年以后中国政府着力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吧。

但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1981年2月25日，以全国总工会为首的9家团体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开始面向青少年积极开展“五讲四美”活动。

所谓“五讲四美”活动，简言之，就是为获得良好人格的口号。同时结合进行的还有“三热爱”运动。而1983年3月11日，中国政府成立了以万里（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为主任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

问题是，后来增加的“三热爱”的内容，就是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在此，作为提倡“三热爱”的基础，大加推崇的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7月）到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国共内战（1945—

1949年)取得胜利以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这28年间的历史。

其中,最为强调的是,从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获得合法性、确保信赖的历史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争取到了人民的支持,并力图在内战中继续获得这种支持。

在了解进行“爱国教育”的目的方面,1994年8月23日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共8项40条)极为重要。其中强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人民日报》1994年9月6日)

以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主,全国各地建立了像中日两军交战地以及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露731细菌部队罪恶的哈尔滨“罪证陈列馆”等,在侵华日军残暴造成

大量牺牲的现场，建立了许多规模较大的战争资料馆。

这些设施被称为“爱国教育基地”，作为全国人民实施教育的场所，包括组织参观、进行宣传教育，目的是为了中国民众广泛了解是通过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胜利，才取得了今日新中国建设的成就。

在中国，继承中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是提高中国人民思想意识必不可少的宣传教育活动。这并不是引发反日情绪的原因，其本身也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图。

由此，日本的媒体热衷于将“反日示威游行”和这种用意的“爱国教育”联系在一起，隐含了对以抗日战争胜利为主要素材的“爱国教育”进行否定和批判的论调，对此中国方面是不可能接受的。

换句话说，认为中国政府通过“爱国教育”煽动反日情绪、将其作为外交手段使用，这种日本方面的反应和反复强调的批评论调，实际上是因战争责任问题未解决，又不愿意被触及的自我认识在作祟。

实际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由于意识到战争责任，

却又试图回避历史的态度，阻碍着自己反省和深化历史认识。

中国方面通过大量地吸取历史教训，努力提高和涵养国家意识的姿态，与日本方面掩盖历史、拒绝承认抗日战争失败的心态，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对历史认识的偏差。

即便是承认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是仍将大肆宣扬侵略行径的靖国神社仅仅看做“祭奠战死者的神社”，日本青年学生事实上持有的这一认识，可以说也是历史认识偏差的表露吧。

在此，想介绍一篇中国媒体发表的有关中国青年对历史认识的评论。

这是《中国青年报》（1995年7月17日）刊载的马小华撰写的题为“历史与我有何关系？”的文章。该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日报），据说发行量约达75万份。

介绍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片段。



《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4日

当一位中国少年被问及日本侵华战争而一脸茫然时，在大海那一边的岛国，却有人用教科书告诉孩子们那叫做“进入”。在一国忘记了历史的

年轻人与一国接受了伪历史的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交往、理解、竞争该如何进行呢？

也就是说，这是存在于中日两国青年中的忘却共同的历史或者偏离历史的问题。

更准确地说，是中国青年忘却历史和日本青年歪曲历史。由于对历史的忘却和歪曲，当然终究难以期待达到相互加深历史认识的目的。

“一个人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完全地意识到自己，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我认为马氏文章的基本论点在此充分详尽地表现了出来。

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正确地记忆历史事实是最根本的前提。所谓忘却和歪曲历史，就等同于自我放弃意识自己的机会，用马氏的话说，这就是忘却“民族精神”。

我从马氏的文章中，想起了过去常常被引用的原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的一句名言，那就是：“看不到过去的人也就看不到现在。”

魏茨泽克总统的名言，不是就一般历史观而言的。那是对纳粹的犯罪、德国过去的历史渐渐漠不关心或熟视无睹的德国青年所说的一句话。那是面对在德国日益扩大的赞美纳粹之声，以及对土耳其移民等抱有敌意的德国国民，谏诤排外民族主义、促进自我反省的警言。

现在，中国政府推进的“爱国教育”，也许正像马氏文章中指责的那样，因为潜在着忘却历史的深刻事态，因此，才将开展爱国教育作为记忆历史行为和明确自身所处位置的基本作业。

对日情感的复杂化

即使在中国，年轻人对历史认识也表现出某种变动不定，其背景之一就是他们所处的信息环境的变化。

据说，中国现在大约 1.1 亿人利用互联网，拥有手机的人超过 3.8 亿人。特别是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中，互联网利用率高达 90%。这次示威游行也同样，充分运用这一网络工具发布信息，示威活动一下子波及全国。

形成了以大学生为中心的网络舆论或者网络社会，好像通过网上在短时间内持续地发起呼吁，组织参加示威游行活动。

例如，号称中国规模最大的新浪网，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正式见解更为激进，对日批判态势鲜明（刘志明：《中日传播与舆论》，EPIC，2001 年版）。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该网站的舆论也不能无视。

另一方面，例如，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发行的报纸《国际先驱报》刊登了题为“朝日啤酒等企业与历史教科书事件有关联”的报道（2005 年 3 月 28 日）。

根据我个人的感觉，中国青年对日情感是极其复杂的，绝不是单一的，表现出多样的情感。

日本政府一贯寻求支持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此日本国内好像表现得积极强烈，即使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依然很低。假定能够实现的话，也不应该将其视为宽恕了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诸国的侵略行为。

同时，以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各不相同为由，日本采用利己方便的历史解释的做法也必须慎重。重要的是在相互认同这种多样性的情况下，朝着达成历史共识的目标逐步迈进。

的确，中日两国看待历史的方式也许有很大不同。中国方面通过一些宣传讨论达成共识，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所表现的淡漠轻视历史感到十分不满。因为如果汲取历史教训的话，应该能避免出现现在这种对中国的姿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地通过历史对话和借鉴历史教训，培养提高国家意识、国家荣誉感。中国人抱有这种鲜明的历史观，由此，在他们看来，日

本人正试图放弃或者否定历史。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再次评价何谓中日战争，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中日关系以及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是怎样形成的？为此，下面通过追溯历史，考察一下近代的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

第二章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一、中国观的萌芽

“大陆国家日本”的梦想

随着持续了近 260 年的德川幕府时代结束，以长州和萨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的结果，是成立了新的政权（1868 年 10 月 23 日改元为明治）。

明治政府可以说是对地方分权制的封建制进行解体，建立彻底的中央集权制，即以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式，在一元统治下加快形成对抗欧美列强的“国民

国家”。

为了形成“国民国家”，明治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尤为瞩目的是1872年（明治五年）9月5日公布了学制，翌年1月10日公布了征兵制。这两个制度的相继颁布并不是偶然的。

明治政府对维护中央集权制国家进行了军事力量准备，为了抗拒欧美列强的压力，抵抗其对亚洲诸地区的入侵，明治政府急于训练大量士兵。根据学制规定，学制的目标是在全国各地创建学校，提高国民的识字率，确保大量的具有相应素质的士兵预备军。

学制和征兵制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表面上都是通过“富国强兵”的口号，试图掩盖事物的本质。所谓“富国强兵”，其实是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以对抗欧美列强为借口，而使本国具备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能力。

那么，想要将日本向大陆延伸，实现作为“大陆国家”而获得飞跃式发展的愿望，是从何时、由谁提出的

呢？我认为，从幕府末期开始大约就能看到其原型。

当然，同是想使日本实现“大陆国家”之梦，动机或方式却也有所不同。既有大肆谈论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实行强硬的侵略主义的，也有提倡通过与亚洲各国人民联合协调，建立“亚洲的指导国日本”这一构想的。

幕府末期的这些议论与昭和初期的侵略亚洲大陆的思想似乎并没有直接联系。即便如此，那个年代感受到欧美列强压力的诸多知识界人士，受到这些言论的触动，谈及日本未来的发展模式时，加大了对亚洲大陆的关注。其中，最为关心的对象就是中国。

将这些议论总括起来，可称之为“亚洲论”。由于西欧诸强对亚洲地区的入侵以及殖民地化的刺激，各种各样的“亚洲论”被提了出来，最终导致日本侵略大陆的思想形成。以下来看一下“亚洲论”的源流。

林子平和本田利明

当时的“亚洲论”的主要特点，好像与技术方面崇尚西方化相反，在精神方面的反欧美化倾向引人注目。这个意义上的日本的国家中心主义，渗透到了包括教育指导思想在内的方方面面。

国家主义的萌芽，在幕府末期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即有所显露。作为对抗西方化而渗透于各个方面的国家主义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对西方世界憧憬向往的要素。由于欧美国家具有雄厚的技术和资本，其席卷世界的气势既是对日本的威胁，也是令其歆羡的对象。

在如何应对西方列强入侵亚洲的文献中，具有这样的主张，就是为了加强日本的自立和防卫，日本也有必要以中国为中心在亚洲争得霸权。对西方的抵触情绪，或许也是这一称霸主张的缘故吧。

这并非自我辩护。这一主张的根本，确实包含了日本人复杂的感情。

为了将日本人的这种复杂感情提升到思想层面来认识，幕府末期，一批希望给后世的日本人带来一定影响和启示的思想家相继登场。通过观察他们的部分思想见解，人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想要努力实现向中国扩张的目的。

幕府末期著书立说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有展开真正的军事外交论的林子平（1738—1793）和本田利明（1744—1821）。林子平在江户后期著有《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和《海国兵谈》（1791年）等，本田利明著有《西域物语》（1798年）和《经世秘策》（1798年）等。两个人均为在日本高中教科书中予以介绍的著名人物。

为了应对推进南下政策的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来自庞大的邻国中国的潜在威胁，林子平极力主张海防论。林子平生于江户时代，曾到长崎求学，熟悉海外情况，被称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海外通。林子平极力主张对抗俄国的威胁，强调开拓虾夷（北海道的旧称）

的必要性。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开始意识到俄国和中国的威胁。林子平较早地提出了对邻近大国的戒备之说。他认为通过扩充军备和加强海防，可以消解忧惧和不安，主张建设军事化的日本国。

林子平的这些主张淋漓尽致地呈现于《海国兵谈》中。但是，因为该内容与幕府的外交军事政策不符，被禁止公开发表。为对抗庞大邻国而建设强大的海防国家这样的国家战略论，在囿于闭关锁国观念的幕府看来，应属毫无道理的主张吧。

相对于林子平的军事至上主义及军事外交论的主张，本田利明主张的是一种贸易立国论，该主张的贸易拓展对象不限于中国、朝鲜，而是包括整个亚洲。与林子平的军事至上主义比起来，这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经济主义。

林子平从军事或国防观点出发，主张将朝鲜、虾夷以及琉球相并列，作为同等重要的地域，强调为抵

御俄罗斯的威胁而领有朝鲜的必要性；本田主张走经济自立之路，志在通过非军事手段促进日本的发展。

本田强调，作为经济自立的前提，应充分利用海洋，将日本发展的基地扩大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亚洲地区。这也是明治初期开始登场的“南进论”的思想萌芽。

另一方面，本田在江户时代学习了日本数学^[1]和天文学，访问了许多国家，进行物产调查，提出了作为富国之策的开放交易论等，在当时以思想进步、颇具独创性的重商主义者而享有盛名。事实上，本田也大力提倡开发虾夷，但他主张是作为经济基地的开发，与林子平所主张的作为军事基地的开发完全不同。

仅仅强调这一点，就能够明确军事至上主义与经济合理主义的差别。但是，明治政府实际上是同时吸收采纳了这两种不同的主张，融合成为一种“富国强

[1] 以中国传入日本的数学为基础，江户时代在日本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数学。——译者

民”的政策。

对于明治政府来说，军事至上主义和经济合理主义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被确立为国家的两个车轮。林子平的军事至上主义，被具体化为俄罗斯威胁论和朝鲜领有论。这些理论也成为从明治初期开始、至中期全面展开的激进的大陆侵略思想的源头。本田的主张，则成为后来以海军军事官僚为中心主张的“南进论”的出发点。

暴力和压制的思想

林子平尖锐地指责闭关锁国的不利，他主张将重新评价锁国政策和普及新型国防思想作为当务之急。因此，林子平的主张一般被视为开明思想。与此相对照，之后的佐藤信渊（1769—1850）则以维护天皇制国家的日本民族优越主义为基础，是位极其鲜明地推行侵略主义的思想家。

佐藤师从宇田川玄随学兰学，并师从田笃胤学国学^[1]。由于所师从的是当时一流的兰学和国学学者，得益于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佐藤十分熟悉西方思想和国家主义等广泛的近代政治思想。

佐藤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论及“皇大御国作为大地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世界万国之根本”。针对佐藤的言论，后人有如下评价：“这是强烈地主张本民族至上主义。强调日本是世界的中心国，世界所有的地域都从属于‘皇大御国’——天皇制国家日本，天皇才是唯一的统治者。”（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有斐阁1970年版）因此，佐藤往往被看做是绝对主义的思想家。

佐藤主张，首先应该归属于天皇制国家日本的地域是中国。他在《宇内混同秘策》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从支那国的满洲开始取之不难，建议‘夺取’中

[1] 兴起于江户时代，研究日本古典的学科，又称为日本古典学。——译者

国东北部（满洲地区）。”佐藤主张的长期国家战略是，日本“夺取”中国东北地区，从俄罗斯的威胁中解脱之后，再为增强日本国力而向适宜发展经济的地域东亚“南进”。

总之，在佐藤的主张中，军事至上主义和经济合理主义不存在任何矛盾，是融合在一起的。至于由此而引发的诉诸暴力夺取的矛盾，皆可由其主张的“天皇制国家日本”的原则获得合理解决。

这种认识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知识分子和日本民众长期共有的看法。

在假设并认定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这样的前提下，对天皇制国家日本来说，“夺取”中国就被视为必不可少的目标，这与之后的日本陆军占领满洲计划的动机极其相似。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在以军部以及右翼为中心的大陆侵略行动的策划中，层层渗透着佐藤及其追随者的这类侵略思想。

例如，民权论者杉田鹑山（1851—1928）在《东

洋恢复论》（1880年）和《兴亚策》（1883年）中也曾主张，为了将亚洲人民从专制权力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在亚洲广大地区扩大民权论的影响是极其必要的。

不过，根据杉田鹑山早期的观点，以朝鲜、中国为主的亚洲，主要应是日本支援和联合的对象，而绝非是侵略的对象。在他的头脑中孜孜以求的“联合”后来竟发展成为“侵略”的结果，这也许是他连做梦也未曾想到的吧？

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以后，对逐渐显露出专制权力性格的明治近代国家的变化，杉田未抱有任何戒心。在明治宪法体制确立的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以前，为抗拒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压力，亚洲也确实一直是日本支援和联合的对象。

尽管不像杉田那样具有明确的姿态，其他的民权论者所抱有的共同目标是打倒明治政府的专制权力，解放处于亚洲地区专制压迫下的人民。可以说民权论正是将人民的解放视为自身的政治目标。

但是，在民权论被国权论取代的过程中，对日本来说，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便从支援和联合的对象变成了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杉田所代表的对中国（当时的清朝）的认识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根据访问中国的体验作出了如下判断，那就是即使有来自日本的支援和联合，中国人民也完全缺少自主地推翻专制统治的能力。同时，他还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

杉田在《东洋攻略》（1886年）中作过如下论述，即日本迟早也会成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象，与其拿出精力支援中国，“不如加紧取之，成为列强同伙”，这样方可避开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

放弃将亚洲作为支援和联合对象的认识，就是由此开始的。自由民权论者杉田的亚洲认识产生了明显的转向。杉田的这种认识转换，也许可以说是在目睹了中国现状后产生出对中国的失望和蔑视，以及领略

了西方近代化的实际后形成的。

杉田并没有看到中国政治和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即这是因为西方列强将中国置于殖民地状态，加之长期的封建专制所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衡所致。与西欧的近代化进行对比，可以说他只不过在表面上阐述了远远落后于近代化的中国的现实。

杉田的根本主张是，既然西方列强将弱国作为资源供给地积极进行殖民地经营，同样的，日本为推进近代化，也应把侵略中国、朝鲜作为极其重要的手段，以加速实现西方式的近代化目标。这就充分地表露了地地道道的侵略思想。

正如杉田这一主张所表明的，在牺牲亚洲的基础上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与试图获得“一国繁荣”的国家利己主义直接相关联的侵略思想的基础，是通过近代化理论培植起来的。

也许杉田的主张就是近代日本人所持有的对中国的认识的共同之处。在自身陷于危难时，迫使他人

(中国)作出牺牲，借此摆脱困境，保全自我。进而若是能促进日本发展的话，恐怕更会愿意作出那种选择。

这就是将中国作为牺牲的替代品而纳入视野的对中国的认识。尽管在最初的动机上是要抗拒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但渐渐演变为以牺牲亚洲为手段，通过夺取亚洲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目标。可以说，这种观念被作为正当理论确立了下来。

侵略亚洲大陆先是作为权力争夺的一个手段，进而又增加了为实施近代化而侵略的内容，即所谓“为了近代化的侵略”的认识。不仅是民权论者持此主张，而且此种观点也开始渗透到统治层以及大多数国民之中。

“为了近代化的侵略”的认识，与今日的开发独裁论相似。所谓开发独裁，就是为了尽快达成近代化(近代化=开发)，须推迟政治的民主化，而倚重于独裁体制(权力的一元化)，国家主要起到发展经济的统帅作用。为了保证开发优先于一切，便有了不惜牺牲

他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构想。由此所派生出的是，肯定暴力行径和确立民族歧视意识。

大陆侵略思想总是以对中国、朝鲜的蔑视或歧视情绪为其基础的。大井宪太郎（1843—1922）十分了解欧洲近代思想，在日本国内以自由党左派理论家著称，他本身也具有大陆侵略思想这类观念。

大井是以支援韩国独立党推翻朝鲜封建社会、将民权扩大到全朝鲜为目标的自由党左派运动（大阪事件，1885年11月23日）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他看来，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本质，民权论的扩大是不可或缺的。

他认为，要推翻剥夺人们自由的专制权力，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人类普遍的课题，并且出于这一认识而策划了支援韩国独立党的活动。

可是，即便是具有这种进步思想并因大阪事件而入狱的大井，在明治宪法发布恩赦获得释放后，其对中国的歧视观念也开始增长，并发展为对朝鲜、中国

的侵略思想。

与杉田在认识上的共同之处是，他也主张作为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手段，对亚洲大陆实行霸权，认为领有大陆是日本的必由之路，其亚洲侵略思想与杉田如出一辙。而且，无论是杉田还是大井，最初都是主张通过扩大民权思想推翻封建专制权力的，但最终因对朝鲜、中国的歧视态度，以对抗西方列强和实现日本近代化为由，在思想观念上将亚洲侵略论正当化。

是什么促使他们转变成亚洲侵略论者的呢？是由于自由民权论本身的局限吗？可以明确的是，在他们看来，即使最终使用暴力（军事力量），也是为了践行自己的“自由”、“民权”思想，是解放亚洲的必要手段。

自由民权论者们最终选择了支持暴力手段，并自行套上了束缚其自由思想和行动的枷锁。本应是作为支援和联合对象的亚洲人民最后成为了暴力的牺牲者，自由民权论者们对这样的转变显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

无独有偶，这样的历史教训是跨越时代不断上演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进行的“为亚洲解放的武力进驻”和如今美军自称“为了自由而战”的“正义战争”，比如入侵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延续了同样的思维方式。

樽井藤吉对亚洲的认识

在探讨日本对亚洲的认识是如何转化为侵略思想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方面，樽井藤吉（1850—1922）对亚洲的认识颇具参考性。

1882年（明治十五年），在长崎县岛原，一些激进的民权主义者结成东洋社会党，樽井是当时的策划者之一。但是，由于该党主张打破贫农世袭和天物共有等原则，明治政府将其视为共产主义或者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明令禁止其结社行为。

樽井是信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活动家。

他对国内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十分关注，并将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来把握。

在樽井的代表作《大东合邦论》（1893年）中，所表现的亚洲观与明治中期以来出现的大陆侵略思想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樽井首先就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日本以重和作为经国的目标，朝鲜以重仁为施治的准则。和与物是相合的缘由，仁与物亦出于同源，由此，两国亲密之情本来出于天然，不可阻止。”（竹内好编：《现代日本思想体系·亚洲主义》，筑摩书房1963年版）

这是从儒学素养中导出的日朝关系论。樽井主张，两国存有共同的、自然的或者说先天的联系，这远远超越了文化和民族的差异；两国进行协作、联合不应受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国家观念的束缚，而是近似于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他主张，为了两国的发展，两国将来的“合邦”是最佳途径。

出于“想要得到两国合邦的成果而不被其他因素

干扰，如确定名称时会由于地位而损害彼此的感情”之理由，将其国名命名为“大东”。

樽井还针对与朝鲜“合邦”对日本不利的议论，作出如下反驳：“虽说朝鲜贫弱，其面积是我国之半，其贫穷是因制度不善，如果实施联合，革其弊端，将会期待其富裕。”

这反映了与侵略朝鲜的观念并不相干的平等观念。樽井将朝鲜未近代化的原因归结为受儒家伦理和道德观支配的封建制束缚。这一主张与大多数亚洲主义者认为的朝鲜未近代化的原因在于其民族性有所不同。

关于与中国的关系，他也进行了如下论述：“纵观竞争世界的大势，亚洲同种的友好国家应该联合一致，与异种人竞争。要求联合的国家，不仅限于日韩，也希望有清帝国。对清帝国现在该达成谅解。”

更进一步，虽说清帝国和日本的“合邦”为时尚早，但是“我们日韩可以先行联合，与清帝国‘合纵’，以防异种人之侮”。总之，因为清帝国内部具有

异种民族的纷争及对立，其国情状态尚不允许与日本及韩国“合邦”。不过，可以提倡“合纵”，即日本和清帝国缔结一种同盟关系，通过加强两国关系而形成亚洲的两个大国共同与西方对抗这样的战略。

樽井的主张，跨越一个世纪之后，与现在的日美同盟论极其相似。今天的日本也有人将日美同盟论作为长久称霸亚洲的战略，强调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若按樽井藤吉所论，这可否说成是“日美合纵”的策略呢？

这些姑且不论，在樽井阐述其主张之时，是明治政府最初的对外侵略战争，即围绕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与中国进行的甲午战争（1894—1895年）开战的前一年。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的时机值得注意。

重新对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以甲午战争为界重新回顾樽井的主张，看看他是如何由亚洲联合论转为大陆侵略思想的。在对此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樽井思想认识中的某些内在线索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与欧美帝国主义的对抗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樽井的上述“合邦”和“合纵”论，是作为与西方近代化路线以及由此派生的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帝国主义的亚洲政策相对抗的一种思想而展开的，其初衷并不主要是为了将亚洲人民从封建专制权力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为了同西方列强进行对抗，就要将亚洲各民族形成同一性质的强大国家作为优先课题。可以看出，樽井的“合邦”论和“合纵”论，是在并未顾及亚洲人民及日本人民的诸多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的，并非出于社会民主化思想。但是在表面上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后者，这就颇能迷惑人。

由此，也可以说樽井的以国家至上主义为基础的日本国家发展论，成为几乎所有的亚洲联合论演变成大陆侵略思想的主要原因。

甲午战争于翌年发生后，日本必须面对的课题是

加速实现西方水平的近代化，为达到这一目的，不仅是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还应该首先推翻亚洲的专制统治，扩大人民的权力，形成以人民为主体的自立的国家和社会。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实际上，后来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中，也明显地含有樽井藤吉对朝鲜、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认识及关系定位。“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也基本上是以樽井藤吉所提出的诸论点展开的，通过被视为必要手段的“侵略主义”这一模式，以军事强力推进其实现。

作为政治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与樽井的主张同样，强调实现日本与朝鲜、中国的自然而然的“合邦”及“合纵”关系，于是获得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共鸣。

甲午战争被视为分别代表新旧文明的日本和中国的对决。在这方面，有论述新文明必然超越旧文明的

内村鉴三（1861—1930）的“义战论”。另外，福泽渝吉（1835—1901）的“脱亚论”，则将甲午战争视为“文明的正义之战”，主张积极推行能够促进新文明发展的对外关系，也就是脱亚入欧；并且积极推行其在“脱亚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由此引出了作为文明比较的亚洲论思想的展开。

在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以及日本的大陆政策强力推进者之一后藤新平（1857—1929）的《日本膨胀论》（1916年）等著述中，可以说几乎也包含着同一性质的侵略思想。

德富于1887年（明治二十年）创立了民友社，发行《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是从主张平民主义的明治时代到大正、昭和时代的一位十分活跃的、对政府也极具影响力的记者兼政治家（曾任贵族院议员）。

德富原本是作为颇有影响力的平民主义者而著名的。但是，自甲午战争后，他转向了国家主义。追溯他的转变过程，一般认为，所谓“文明论”及其思想

起源的探讨，结果只是为了将扩张主义和侵略思想加以正当化的议论。德富的主张所暴露出来的是强烈的国家主义，又可称为国家利己主义。

自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以后，德富的主张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将其以前曾向往过的与亚洲联合与协调的观点搁诸脑后。看来，许多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口头上所说的与亚洲联合，追求亚洲共荣，最终只不过是用以掩盖日本侵略亚洲的不当性和暴力性的遮羞布罢了。

日本把入侵别国的战争说成是为促进亚洲文明的正义之战，在之后的“东亚共同体论”以至“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被继承延续下去。虽然我并不是要否定所有持亚洲联合论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其中有人也许确实抱有善意的动机，但事实上以德富为代表的强烈的国家主义占据了优势。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下面我想对德富的观点进一步加以考察。

德富苏峰和陆羯南

一般认为，日本的大陆侵略思想形成期是在自由民权期以后的明治 20 年代。在明治时期的新闻界颇具影响力的德富苏峰，自甲午战争之时开始主张侵略。

虽然当初他主张在西方近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形成欧洲式的市民社会来实现平等主义，但是自甲午战争开始，他就极其露骨地大肆颂扬日本民族扩张主义。

德富主张，有必要对至今具有潜在威胁的对象——中国加以警戒。在《国民之友》（1894 年 6 月号）发表的著名文章《日本国民的扩张性》中，他将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视为善举，而将中国看成是妨碍日本扩张政策的最大障碍。在他看来，如果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不能取胜，那么就不可能实现日本未来的发展。

德富持有的中国观的特征，不过是为了使日本扩张主义及侵略思想正当化，将庞大的邻国中国设定为

潜在的威胁对象。他将与中国的有关冲突看成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具有积极意义的绝好素材。

德富的中国观虽然完全缺乏合理性，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这些观点通过《国民之友》等刊物，在煽动和扩大对扩张主义的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

进而他还强调，甲午战争以后为对抗西方列强入侵亚洲，应该加强日、韩、清三国“联合”。在此情况下，当然应由日本担任盟主，这是形成“联合”的先决条件。

联合论中，具有联手以对抗外来强力这一最初的含义，同时亦隐含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须应对国际地位变化的措施。但是德富所谓亚洲诸国对等的“联合”，绝不只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入侵，其最主要的考虑不过是以保证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为目标的“联合”，只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露。

接下来看一下陆羯南（1857—1907），他的情况与德富大致相同。在其政治和评论生涯的早期，陆羯南通过报纸《日本》，表达了应对西方的近代化和技术主

义，应发挥亚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立场。他在与西方的对比中强调亚洲主义，对于像德富那样露骨地主张侵略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

虽然陆羯南是从法学院校中途退学成为官吏的，但是后来他因为极力反对明治政府过火的欧化主义政策而辞掉了官职，是位颇有气节的人物。之后，为了论述自己的主张，他创办了《东京电报》（1888年），翌年改名为《日本》，对全盘西化展开辩论。

可是，陆羯南在《近事政论考》（1891年）中，也主张通过以日本为主轴实现亚洲“和平”，其结果也是将对中国的侵略变得正当化。如果说德富是直言不讳地宣扬中国潜在威胁论，陆羯南则并不把中国视为威胁的对象，而是欲将其纳入日本阵营，放在了日本联合伙伴的位置上，共同抵抗极端的西化，并以日本特有的文化和思想等来应对。

由此可见，陆羯南和德富两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显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包括对朝鲜关系在内，只有日本是

主导的这种亚洲观方面，两者殊途同归，最终都发展成为侵略思想。由此，便将本应受到谴责的侵略别国的行径看成是对朝鲜和中国进行所谓“善导”的行为。

在这方面，与樽井的论点雷同的还有内田良平（1874—1937），他在后期的《支那观》（1913年）中，将中国看做“畸形国”；内藤湖南（1866—1934）在其《支那论》（1914年）、《新支那论》（1924年）中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等；他们在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

总之，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常识来看，中国是性质极其不同的国家，与国际社会一般的思维观念有很大偏离。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看法，可以说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从根本上带有对中国的歧视或轻蔑。同时，这种感受又与力图排除异己、以本民族的优越性为主导的“共存”思想潜在地联系起来。

就这样，通过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反复地强调反对中国的论点及观念，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又露骨

地表现出对中国的强压姿态，便源源不断地将否定中国社会的观念强加于日本的国民意识。

在如此讨论对中国的认识的同时，明治政府一步步地推行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在明治政府成立后的仅仅第6年（1874年），就出兵台湾（台湾称之为牡丹社乡事件），第7年（1875年），又展开了对李氏朝鲜的炮舰外交。

在下一节，我来看一看可称之为侵略中国起点的出兵台湾的经过。出兵台湾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意图呢？

二、侵略中国的起点从何时开始？

出兵台湾

在步入近代国家方面痛感落后于欧美列强的日本，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颁布了大日本帝

国宪法（明治宪法）。自此，改国号为“大日本帝国”，这便是所谓的“日本帝国”的登场。

日本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17日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与清政府缔结了和约，清政府向日本交付2亿两白银的赔偿金（相当于当时的3亿日元），并将清帝国的领土台湾以及澎湖岛等割让给日本，由此日本成为了殖民地领有国。

但是，在公布明治宪法的15年前，即1874年（明治七年），日本即已发动了对外战争。那就是明治政府最初的海外派兵——出兵台湾。

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是这样的：

出兵台湾的前一年，即1873年（明治六年）8月3日，当时任明治政府参议的西乡隆盛（1827—1877），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请求内阁决定向朝鲜派兵的意见书。8月17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西乡的意见书，但条件是要等正在国外考察的岩仓具视一行归国后再付诸实施。

西乡的意见书中所表明的围绕所谓“征韩论”的争议，彰显着权力斗争的内情。这一年1月，日本实施了以全民皆兵为主要内容的征兵制，由于担心在军事部门的独霸地位有崩溃之虞而加以反对的武士家族，希望把朝鲜作为自己炫耀武力的舞台。欲借实施征兵制建立近代军队的势力，和力图维护武士阶级利益的势力之间产生了对立。

前一种势力试图通过中央集权制来实现近代国家的构筑，在其看来建立政府直辖的强大的近代军队是必要的。而后一种势力则为在激进的近代化中将失去既得的利益而深感焦虑。

为了避免与中国（清帝国）和俄罗斯，乃至欧美列强发生摩擦，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有实力的参议员对出兵朝鲜持反对态度。在遭此反对的情况下，西乡辞去了所有官职。出兵朝鲜也无限延期。明治政府成立才6年，就围绕海外派兵展开如此争论，其意义非同小可。

出兵朝鲜的计划落空，取而代之的却是出兵台湾被强力推行。

1874年5月17日，西乡隆盛的胞弟、担任陆军中将的西乡从道率领3600名兵士，抵达了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附近，并于5月22日在牡丹社乡登陆。这一事件成为明治政府最早的出兵海外的标志。

台湾出兵的起因，一说是居住在台湾南部牡丹社乡的台湾岛民（排湾族，Páiwān族）杀害了漂流到此地的琉球渔民，由此引发了日本国内要求实施报复的行动。另一说并未否定这一事实，却把事件原因解释为牡丹社乡岛民救助了因台风漂流而来的琉球渔民，并提供食物等照顾，但由于未能进行足够的沟通而引发悲剧。

无论琉球渔民被害事件的细节究竟如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此事被早就图谋出兵海外的势力视为良机，于是西乡从道率领3600名拥有现代装备的日军入侵该地，杀害了许多当地居民。

出兵台湾的背景，隐藏着日本政府企图对清帝国的台湾领土实行统治的意图。事实上，在出兵台湾 10 年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如愿以偿地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领土。

早在明治政府刚成立时，日本即对台湾怀有野心。后来只不过是找借口使侵略正当化，将侵略战争冠冕堂皇地解释为“正义的战争”。成为明治政府首次海外派兵的出兵台湾，便采取了以保护和解救日侨为由而投入侵略军的战争模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中，如果与日清、日俄战争等明治期间对外战争研究相比较的话，不得不承认，对于出兵台湾至 1895 年 6 月 7 日占领台北这段时期的台湾军事占领作战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除了资料收集方面的困难，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对亚洲外交政策特别强调日清、日朝关系（1871 年日清友好条约、1876 年日朝友好条

约)，而缺少以独立视角进行日台关系史的研究。同时，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将日台关系史视为日清关系的附属或延伸来把握，而对日台关系及历史事件没有足够的重视。

根据战后日本历史学，一般是将甲午战争看做“日本最初正式的对外远征（海外派兵的第一步）”，而不是出兵台湾。这显示出对出兵台湾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十分淡薄。

我一直抱有这样的认识，不断探索出兵台湾的意义。2003年11月23日，在台湾屏东县牡丹社乡召开了查证牡丹社乡事件的国际会议，我应邀参加大会并作了报告。

在西乡从道率领的3600名日军兵士与排湾族居民进行激战的地点，我徘徊良久，陷入沉思。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仅仅持有极少量的土枪，以及弓、刀的排湾族人，面对具有现代装备的日军，英勇不屈地进行了殊死搏斗，终因力量对比悬殊，无法抵挡拥有



在台湾牡丹社乡 54 名琉球藩民墓碑前（笔者摄于 2007 年 6 月）

现代装备且严格组织起来的日军大部队，多数人牺牲。

这是现代军队对于中世纪式的民间武装的格斗状况。不难想象，由于战斗力极其悬殊，导致一边倒的杀戮情景。在报告会的会场上，有参加过与日军战斗的排湾族的后裔。他们很想知道，来自日本的历史研究学者在这一场合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他们听得十分认真，唯恐遗漏掉什么。

他们忍受着先人惨遭屠杀的强烈屈辱，历届日本政府，包括战后的日本政府，却从不提及这段悲惨的历史，也没有谢罪表示，让他们无比愤慨。即使台湾从作为日本殖民地归还中国后，他们的先辈遭遇的这一民族灾难在台湾历史中也长期被湮没，至少，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当政的时期，似乎是作为不值得提及的事件而一直未被重视。

2007年6月4日，我再次访问了牡丹社乡。此次是为出席一个吁请建立牡丹社乡事件纪念公园以及纪念碑的讨论大会。这次大会也邀请了台湾“立法院”

的议员们出席，热烈的讨论持续了一整天。

在讨论会上，我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也就是牡丹社乡抗击日军入侵事件所固有的历史意义。造就这一历史的民族是值得骄傲的，这是对近代日本露骨地进行霸权扩张的抗击之战。我还结合 1945 年日本战败，在叙述排湾族人民遭受现代国家暴力而牺牲的同时，阐释了实施暴力的国家最终将走向失败的规律。总之，该事件除了是近代日本向海外扩张的标志性事件以外，还充分显示了台湾排湾族人民的不屈性格，对侵犯自己生活空间的入侵者自发地进行反抗的大无畏精神。

帝国主义和文明化

在牡丹社乡这次讨论会上，我着重强调了一点，即日本称为“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乡事件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我认为，正是以出兵台湾为契机，明治政府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性格和构造。因此，有必要深

刻地把握 1874 年强行出兵台湾以及 1895 年占领台湾的意义。

关于如何把握出兵台湾与甲午战争时期军事占领台湾的关系这一问题，我还介绍了以“脱离华夷秩序”和“加入万国公法秩序”为分析框架所进行的研究。

在此，我的假说是，无论是出兵台湾还是占领台湾，都是通过“文明化”的意识掩盖了侵略性、排外性。同时，由于强调出兵政策和占领政策的正当性，可以由此验证明治政府或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本质，以及“近代化”所包含的负面因素。

现就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甲午战争进行评价的背景特征加以整理，进一步探讨日本侵略思想形成的谱系。

在出兵台湾以及占领台湾中所采用的手法，后来成为了日本帝国获得殖民地和强行实施扩张政策所采用的惯用伎俩，也成为战后日本人在对台湾认识方面纠缠不清，明显与事实相悖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战前许多日本人在被“文明化”意识渗透的同时，自发地支持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而战后的日本人依然没有从这种思想中充分解脱出来。

在此，想要重点指出的是，第一，在战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中，对出兵台湾以及占领台湾并未确定相应的历史位置。即使在一般层次上，也大都停留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是井然有序地推进的这种看法。加之战后也受到所谓台湾人“亲日情感”的支撑，由此想要认定日本对侵略台湾并以之作为殖民地的罪责，并且进行历史反省，便比较困难。许多日本研究者没有抱着真诚地面对历史、从中吸取教训这样的基本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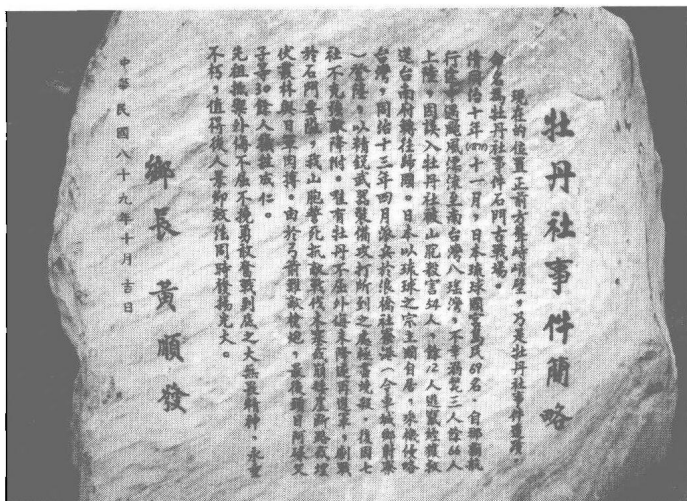
第二，应重新探讨明治政府形成过程中“文明化”的意义。“文明化”在促进国内现代化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渗透作用。为了对外扩张，必须将殖民地的人民视为“野蛮人”或者是启蒙的对象，将进行“文明化”规定为大和民族的高尚使命。而事实上，所谓“文明化”，就是将在这一过程中派生的野蛮行为、

暴力、侵略等给予正面解读，将其“正常化”的意识过程。因此，我认为，对于所谓的“文明化”意识，它究竟是用什么方式，以怎样的语言来主张和强调的，有必要细究历史，按照实际情况加以梳理，以明确其欺骗性的内涵。

出兵台湾的起因，是1871年（明治四年）9月13日签署的《日清友好条约》所规定的日清关系对等化。根据该条约规定，明治政府试图将当时属于“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的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划归日本。我认为，出兵台湾是为了向国内外明确这一举措而采取的强硬手段。

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54名被牡丹社乡居民杀害，日本决定对此进行报复，大举出兵。

西乡从道宣称，对台湾的报复措施是作为“日本帝国政府的义务”，“讨藩的公理也是基于此原则”。总之，出兵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表明琉球属于日本。



牡丹社乡事件纪念碑

也可以认为，正是以“讨藩的公理”而试图将出兵台湾正当化的这种国家本质，构成了1894年占领台湾的背景。成为占领台湾起因的甲午战争，也是与当时日本最大的外交悬案即朝鲜的藩属问题直接相关的。

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宣传为“文明的战争”，即“文明国”日本与“野蛮国”清帝国的战争，成功地赢得

了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福泽谕吉和内村鉴三等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也采用行使“文明”国家的正当权利这样的解释，积极地支持日清战争。

日本企图占领台湾有以下背景：为了成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必须拥有若干殖民地，正如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所表述的那样，与朝鲜并重的台湾是“必进入之地”，为对抗欧美诸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对朝鲜、清帝国的台湾的占领都被视为当务之急的课题。

但是，鉴于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得不调整该时期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因此占领台湾就成为了优先的考虑。

因此，在没有被列入清帝国的华夷秩序、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台湾发生牡丹社乡事件（1871年1月）之后，围绕事件的处理，明治政府在经过一番斟酌后，终于在1874年（明治七年）2月6日内阁会议上确定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

该要略第一条即表明：“清帝国政府将台湾土蕃部

落视为不必要之地。即便是既往清帝国刊行之书籍，特别是去年前参议员副岛种臣赴清之时，根据清朝官吏的回复也可判明其为无主之地。就我藩属琉球人民被杀，实施报复应为我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讨藩公理也是基于此原则，以期讨藩抚民。”[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10）第7卷，日本外交文书颁布会1955年版]

也就是说，正因为台湾位于华夷秩序外域，明治政府对其强行发动了军事攻击。

当时明治政府内对于出兵台湾的态度并不一致。1874年4月18日，木户孝允明确表示反对出兵，并且辞职。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也对此持消极态度。同时，英国、美国、俄国也态度鲜明地表示对日本出兵台湾不予协助。结果，明治政府一度中止了出兵台湾的计划。

被任命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台湾远征军司令官）的西乡从道陆军中将，已经在长崎港为出击台湾做好

了准备。他对明治政府中止计划的决定提出异议，并于5月2日派先锋部队出击。为了阻止西乡蛮干而前往长崎的大久保利通，劝阻西乡失败，结果只能对出兵事实予以事后确认，并作了相关承诺。最终，强行实施的出兵台湾，投入了约1000万日元战争费用和约3600名兵士。

台湾平定后，明治政府的善后处理，围绕所谓的“赎金说”和“占领说”两种选择方式展开了争论。据判断是因为难以承受“占领”所伴随的财政负担，故采纳了“赎金说”（换算成赎金将占有地归还给清帝国）。由此也证明在殖民地占领国所需的相应资本实力以及维持秩序的军事力量方面，日本还内府空虚，并不具备相应的实力。

在此情况下，日清之间进行了多次交涉，最终清帝国方面承认日本出兵台湾属于“义举”，日本得到50万两白银（折合约77万日元）的赎金后从台湾撤兵。10月31日，日清之间签定了互换条约和互换凭单，结

果是清帝国和日本相互承认琉球、台湾为对方领土。

作为出兵台湾的解决方式，这一条约的内容表明，日本政府基本上再次接受了清帝国外交原则的华夷秩序以及册封体制。由此，也对按照传统向清帝国朝贡、由清帝国册封的朝鲜王国采取了慎重姿态。

当时，朝鲜对清帝国和日本两方面都结有朝贡关系，与日本和琉球缔结有称为“交邻”的对等关系。日本虽然一方面容忍这种名分不清的外交关系，一方面又不安于现状，故终于在出兵台湾 10 年后，再次筹划脱离或者解体华夷秩序，开始与清帝国发生冲突，即甲午战争。由此发展起来的日本帝国，后来更面向亚洲肆意寻求侵略的机会。

万国公法秩序

自出兵台湾开始，在政府内部已有这种预料，即认为在亚洲地区迟早会迎来与帝国主义列强对立和竞

争的时代。由此，日本开始筹划解体清帝国的华夷秩序，向亚洲地区入侵。

作为反对旧有的华夷秩序、进而使之解体的理论基础，明治政府主张的是万国公法秩序，认为独立国家之间建立在法律上对等和相互平等原则上的秩序，才是普遍的世界秩序。

万国公法秩序，又可称为横列型秩序，与华夷秩序这种将清帝国作为最高朝贡对象的阶层型的秩序完全不同。这是按照国际法的一定规则形成的世界秩序，被视为新兴国家的日本对此十分欢迎。另一方面，该秩序又不完全否定战争手段和殖民政策，显然也是为帝国主义列强所中意的世界准备的。

以出兵台湾为契机，明治政府内部已准备解体华夷秩序，开始出现以形成万国公法秩序为目标的国家战略。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切断与清帝国和朝鲜的关系解体华夷秩序。

清帝国虽然将台湾视为“化外之地”，却也确认是

本国领土。所以，在围绕台湾问题的日清交涉中，出现谈判决裂在所难免，对此，在日本国内也有战争不可避免的议论出现。也许鉴于这样一种背景，清帝国在日军从台湾撤出后，对台湾的关注比以往加强了许多。

清帝国先是签署了《日清友好条约》（1871年9月13日），之后又承认了日朝间签署的《日朝友好条约》（1876年2月27日），可以说也已抱有一种参与国际法秩序的姿态。

但是，由于日本出兵台湾，彰显了本国领土可能被侵占的危机，清帝国表现出的反应比预想的更为强烈。台湾是清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使是“化外之地”，亦不可拱手让人，故鲜明地表示坚持华夷秩序的保守姿态。20年后发生甲午战争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所谓甲午战争，可以看做由出兵台湾尝到甜头、并企图形成万国公法秩序的日本和力保华夷秩序的清帝国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近代亚洲的利益格局重组过程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仅以围绕占领朝鲜而产生的帝国主义对立论或霸权争夺论来看待出兵台湾，理由是极不充分的。

侵略模式

历史时常会有其吊诡的一面，以出兵台湾为远因的甲午战争的结果，根据 1895 年（明治二十七年）4 月 17 日签署的甲午和约，终于使日本获得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另一方面，以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汉人有权势者和乡绅阶层为中心，发表了《建国宣言》（1895 年 5 月 23 日）。台湾人民由此开始了反对台湾殖民地化的抵抗运动。

根据当时日本政坛元老之一松方正义所述，对于日本来说，台湾是“南门的关键”，是“北守南进政策的第一根据地”（德富猪一郎编：《公爵松方正义传》，

松方正义公爵传记发行会 1935 年版)，认为占领台湾就可以保证向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以至南洋群岛扩张。

这之后，实际上明治政府的决策者就已经明确地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政策的一大据点了。

同时，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当时的列强，也对占领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怀有极大兴趣。鉴于此，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加紧了军事占领。

尽管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付出了极大牺牲，但最终是以对台湾实施残酷镇压而达到了军事占领的目的。这是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中，鲜明地表明日本也将以帝国主义的立场跻身其间的典型的侵略战争。

从出兵台湾（1874 年）到甲午战争（1894—1895 年）所表现出的侵略模式，成为这之后日本帝国反复运用的侵略模式的原型。也就是说，在既定的侵略目的地故意制造危机，然后以应对危机为借口，貌似正当地行使武力。

日俄战争也是这样。为将朝鲜半岛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明治政府设定了俄罗斯夺取朝鲜半岛的危机，由此引发了战争。九一八事变更是如出一辙，为了证明本来就是通过日俄战争获得的“满蒙”（中国东北地域和内蒙古）权益受到了侵犯，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

占领台湾的过程，使日本开始拥有殖民地，向着帝国主义国家转变。日本在台湾所显示出的，是利用军事强力对亚洲民众进行残酷统治和压迫的体制，日本开始赤裸裸地暴露出其民族自大的、排外主义的思想意识。

通过日俄战争，于翌年（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9月15日签署日俄和约（《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了南桦太和租借地、关东州以及满铁附属地。

继而，按照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8月22日签署的日韩条约，日本强行并吞了韩国。稍后，同年8月29日，日本将韩国的国号再次改为“朝鲜”，设置

了朝鲜总督府。

1914年（大正三年）8月23日，日本站在协约国一方与德国开战，由此占领了原为德国占领的散布在密克罗尼西亚（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新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等。

日本帝国以战争为手段推进资本主义和实现近代化，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了与欧洲列强同样作为殖民地领有国的梦想，大大扩张了帝国的经济版图。

对日本来说，维持扩大经济版图和确保从统治地区获得利益，成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最大的国家目标。

为了将统治地区作为日本的经济圈加以有效的利用，并确保将由此获得的利益顺利输送到日本，需要确立和遵循一定的方针，实施一定的经营战略。

在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之后，成为领有殖民地国家的日本，将殖民地以及统治地区作为国家发展的基

础。当时日本的领导层为整備国家体制以备日俄再战，提出了以增强国力为目标的“战后经营”。

同时，围绕“战后经营”的方式方法，统治层内部发生了对立冲突，关系变得复杂。经过各种协调和妥协，最终为维持扩大的统治地域，确立了保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对统治地域实行强权统治的体制。但是事与愿违，这一做法导致了日本国力衰减。

“战后经营”开始成为日本帝国重大的内部压力。一直到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亚洲诸地域殖民地市场争夺激化的过程中还伴随着种种外部压力。作为殖民地保有国，受到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如此压力，这恐怕是始作俑者们没有想到的，故而在政策执行中显得动摇不定。

“战后经营”其实不仅限于以殖民地为主的统治地域的“经营”这一问题，可以说还关系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的课题。

围绕“战后经营”的方式，加之国内政治、军事、

外交格局的不断变化，领导层内部的对立和妥协反复交替地进行。在这一意义上讲，解读日本的“经营亚洲”的实质，实为把握日本近代史的脉络的必需。

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帝国进行“战后经营”的地域，是以“本土”为基点向外扩张的同心圆。

虽然台湾和朝鲜这两个直辖殖民地离中心最近，但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是以日本、满洲（中国东北部）及新占领的中国其他领土为“东亚新秩序”建设的主要目标，并将其经济圈进一步构想为以“日满华”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更为广大的地域。

这是在与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业已形成的固有经济圈的对抗中摸索形成的。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均处于劣势的日本，为抗衡列强，只能过分倚重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则需要一定的经济圈作为经济

基础。

日本帝国以甲午战争夺取台湾和日俄战争后插手满洲为开端，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进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悍然对东南亚实施军事占领政策，在该地区实质上也成功地实施了殖民地化。

这样，在推进亚洲诸地域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以日本帝国的“本土”为基轴，从直辖殖民地（清帝国的台湾、朝鲜）到傀儡政府“满洲国”，再到半殖民地化的中国、军事占领地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广大地域，就形成了两圈、三圈乃至更多的环绕日本的同心圆。

日本从其势力范围的各个地区获得的资源，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台湾作为日本国内十分缺少的砂糖、樟脑等产品的粗加工基地受到重视。朝鲜作为将来向大陆国家日本飞跃的桥头堡，具有战略作用。当然，评价清帝国的台湾和朝鲜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是多样的。

但是，对英美开战所获得的东南亚以及太平洋诸岛的价值，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确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中，有如下明确记载：塞里伯斯岛 [Celebes, 后改名为苏拉维西 (Sulawesi),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Sumatera,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Java, 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 (Borneo, 印度尼西亚) 等，“确定为帝国领土，努力作为重要资源的供给地进行开发，并掌握民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藏：《御前会议议事录》）。

由此可知，以多种目的占领的统治地域，同时又是产生军事、经济利益的对象。为了维持并从中获得利益，进而促进扩张的“经营”战略，是在占领台湾、朝鲜之后就已经形成的构想。

可是，对于用“战后经营”一词所概括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他统治地区的经营本质，有必要用概括近代日本整体发展的用语“帝国经营”来加以进一步梳理。

“帝国经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各个地区是有所不同的。既有诸如在台湾地区和朝鲜设置总统府、以军政形式实施统治的地方，也有像“满洲国”一样，虽然表面上是该国的皇帝和政府发号施令，但实质上完全是作为日本的“傀儡国家”，是由日本军政官员强行实施统治的地域。

另外，还有被日本承认为“独立”，事实上却通过保护国形式实施统治的缅甸和菲律宾等地。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当年的出兵台湾成为了萌发和促进“帝国经营”思想的契机。

甲午战争的评价

不言而喻，继出兵台湾之后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对之后侵略思想的展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甲午战争是围绕占领朝鲜半岛而与中国展开角逐所引发的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对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本由此获得了对朝鲜半岛事实上的统治权，明确了大陆政策的框架。朝鲜半岛被确立为日本进攻亚洲大陆的桥头堡。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迅速取得胜利，为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带来很大转机，使之从西方列强面前的被侵略国、被压制国的地位，向与西方列强同一性质的侵略国、压制国转变。

从幕府末期开始的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思想，在甲午战争中不再是议事桌前的空论。在日本通过军事力量将昔日的梦想付诸实施时，不仅是进攻大陆论的鼓吹者，在许多普通国民的意识中，“亚洲强国日本”的印象也突然增强，这是不难想象的。

甲午战争所带来的“强国日本”的印象，通过从明治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接连创刊的报纸杂志得到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国民对教养、娱乐等需求增多，是报纸杂志的媒体影响力极盛的时期。

例如，甲午战争期间于 1895 年 1 月创刊的《太阳》

杂志，采用的这一刊名即寓示了“现在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注目，是将来充满荣光的国家，其存在正如同‘太阳’一般”。

另外，在同年11月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上，町田忠治（1863—1946）就创刊的意义有如下论述，即“成为东洋唯一的立宪强国”的日本为了发展成更加强大的国家，“若将西欧诸国欲要夺取的东洋贸易控制于我手，将来不定何时，将能够把握住东洋的商权”。该杂志为确立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霸权而积极提供信息，显示出极大的热忱。

具有这种基调的杂志还可列举很多，比如《世界之日本》（1896年创刊）、《中央公论》（1899年创刊）等。这类杂志力图在国民意识中创造一种“大国意识”或“一等国意识”，也确实如愿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国意识”和“一等国意识”一方面必然是创造妄自尊大的国家主义，与此同时，以甲午战争为起点陡然增强的这种意义上的内向国家主义，必然带有强烈的

排外主义倾向，可谓又明显转换到了外向国家主义。

内向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为本，以保守或坚持民族传统文化为最大的价值目标。而外向国家主义最主要的则是在将日本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对比中，确保日本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为价值目标。由此，外向国家主义必然包含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意识或蔑视感。

另一方面，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界真正开始的初期帝国主义，还须依靠向英国等国贷款来维持日俄战争费用，属于尚未成熟的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帝国主义须依赖欧美、明显地缺乏自足性的未成熟的帝国主义这一现实，是侵略大陆思想蕴含的急欲向中国大陆扩张心态的根本原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潜意识中存在的对欧美极其卑屈的从属心态。

日本主义的形成

蕴含着这样的心理原因，在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开

始真正形成的过程中，值得注目的恐怕是在《太阳》杂志中主持论争的思想家高山樗牛（1871—1902）的日本主义论。

高山尖锐地批判说，占据明治时期思想界主流的国粹主义过于强调反欧化理念，不能超出一国主义的范畴，只能提供缺少世界视野的议论。

因此高山主张的是蕴含日本向世界国家飞跃志向的理论，是一种超越国粹主义的“日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按照“日本主义”的理念，应从思想上、精神上强制地动员国民面向日本国家共同体，将国家的价值和国家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首要位置。

“日本主义”不像国粹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只是在日本文化传统和遗产方面求得民族一体感。“日本主义”主张为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最重要的是在创建一个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强国的目标中，求得民族一体感。

正是向自足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转换，成为了“日本主义”的本质命题。此中最为迫切的课题是，要建

设一个足以与欧美先进帝国主义并立和进行竞争的强大的亚洲国家。

在展开这种争论的过程中，被反复强调的是日本民族的扩张性。而鼓舞这一扩张性的就是前面述及的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正是德富的日本扩张论，成为之后渐渐形成的日本人的大国意识或“帝国意识”的雏形。

在这一点上，与高山樗牛对国粹主义的批判一样，德富的扩张主义也对国粹主义的保守性进行了批判，主张寻求在外向性方面争取日本国家及日本民族的发展。总之，主张面向国外寻求发展。

这实际上就是侵略思想的本质，德富因甲午战争获胜，获得了向侵略思想飞跃的契机。对于德富来说，正是不是出于防卫而是主动进攻的甲午战争，给日本向大陆扩张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

在该时期，除了德富苏峰之外，还有历史学家山路爱山（1864—1917），他积极倡导参与世界殖民地

的争夺，作为争取到参与地位的“大国民”日本民族，他主张应奉行的只有强者才能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坚持到底的“适者生存论”。

另外，还有思想家浮田和民（1859—1945）就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分割世界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伦理的帝国主义”等。这些学说被广为宣传，五花八门的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在舆论界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在德富苏峰和福泽谕吉等代表明治时代知识分子所表述的使甲午战争完全正当化的言论中，对于为对抗欧美列强须加强日本防卫，以及对朝鲜、中国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同时，将西方列强的动向视为日本的危机，将甲午战争积极地评价为日本扩张的一大契机，这些认识可谓根深蒂固，并且影响着日本国民。

在“战后经营”的名目下

明治二三十年代的侵略大陆思想，日俄战争后，

在已经成为最大政治赌注的所谓“战后经营”的国家目标中被继承延续下来。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1月25日，政友会出身的西园寺公望首相在第22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讲道：“经营满洲与保护韩国同时为发展帝国而努力，国力的发展也刻不容缓”（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二卷，宝文馆1924年版），强调向满洲和朝鲜半岛的扩张和经营应占据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

此即表示以军事为后盾，将抵抗西方列强、在中国和朝鲜争夺霸权为国家目标。正是这一“战后经营论”的展开，进一步加速了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大陆思想的真正形成及实践。

最终，到明治中期，侵略思想真正地进入付诸实施的阶段，其直接执行者是日本陆军。陆军在整个日俄战争期间，动员了109万人的兵力，结果战争死伤人数为12万，投入战争经费17亿日元。

其结果是，日本取得了占领桦太南半部、获得俄

罗斯租借地（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权利，并且获得了对朝鲜半岛的独占统治权。日本一举扩大了殖民地，在外获得权利，开始步入自足的以及被外部公认的帝国主义国家之路。

侵略大陆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本是以大陆政策的形态逐渐发展。最终，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2月9日，由陆军总参谋长大山严上奏，根据明治天皇采纳的《明治三十九年日本帝国陆军作战计划策定纲要》成为了正式文书。

该文书中明确记有“明治三十九年以后帝国陆军的作战计划采取攻势原则”的条文（陆军省编：《明治天皇御传记资料·明治军事史》下卷，原书房1979年版），改变以往的守势作战，采用了攻势作战为战略上的基本方针。

以后，日本陆军的作战计划一贯采用攻势作战。侵略大陆作为与日本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行动，被作为实践的对象。

下面通过在陆军中大力推行侵略大陆思想的军事官僚田中义一（1864—1929）的资料，介绍一下该时期日本陆军的侵略大陆思想的内容。

在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撰写的《随感杂录》中，田中就《明治三十九年日本帝国陆军作战策定纲要》的预想内容记载如下：“战后经营并非仅仅具有决定陆海军兵力的单纯意义。详述关联我帝国国策的大方针，在海外须拥有保护国和租借地。并且日英同盟的结果并非是以向来的单独守势作战为国防之本质，而必须将攻势作战作为国防的主要着眼点，以此为基础作为战后经营的第一要义。”（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藏：《田中义一关系文书》卷八）

田中的国防思想驳斥了山本权兵卫（1852—1933）所代表的海军主流派同时期主张的“岛帝国”论，赤裸裸地表达了要构筑“大陆国家”日本而谋求国家发展的方针。

同时，这一内容又是彻底地承袭了德富苏峰等的

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1907年（明治四十年）4月，这一方针成为“帝国国防方针”被正式确立下来。

在此，就有关该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的认识加以介绍。

1906年8月31日，山县有朋接到了田中义一起草的《帝国国防方针案》（通常称为《田中奏折》），其中有“国利国权的扩张应首先计划面向清帝国扩展”，将中国确定为“国利国权”的对象地域，并断言，侵略中国是“帝国所赋予的权利”。

田中对中国的认识中，还是具有难以消除的对中国的歧视。正如其所言，“清帝国没有自我保持国内秩序之能力”，他对主权国家中国的统治能力评价过低。同样，他在《随想杂录》中也写道：“清帝国将来取得大的发展，达成可能挫败各国欲望的盛运，其发展还甚为遥远，几乎近于空想。”

但是，实质上担负拟定“帝国国防方针”职责的山县有朋，并没有像田中那样直接散布排斥中国的言论。

例如，在《战后经营意见书》（1905年8月）中，山县有朋主张，准备与俄罗斯再战，“第一，密切与清帝国政府的关系，通过该国的进步发达以图东洋安定”（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

在与中国保持对等的立场上，通过加强外交关系和联合，共同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便是山县所推行的中日一体论。

山县在《对清政策之所见》（1907年1月）中也评价道，对俄战争中维持清帝国的中立态度。即，虽然对中国国内象征收回利权运动的反日态势抱有警戒之念，但不是以战争政策去对应，而是“对清帝国主要发展外交，避免引发无谓的误解”（同上），主张对中国的外交坚持慎重态度。

这的确是合理的判断，但是由山县拟写的正式文书《帝国国防方针案》（通常称作“山县奏折”或者“山县元帅奏案”）中，亦有“将来我国利国权的扩张以计划面向清帝国扩展有利”，几乎照本宣科地沿用了

“田中奏折”。可以说其对中国的作战概要，或者对中国的认识与《田中奏折》如出一辙。

大陆国家构想的实现

在《帝国国防方针案》第一项“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中，强调了“国权的扩张”首先以满洲和韩国为对象，其次从东南亚向太平洋扩展。该国防方针认为，从这些地域获得利权关系到“增进国利民福”，主张由日俄战争所获得的满洲及韩国的利权进一步扩大，今后的使命是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的势力。

该内容与田中义一在《随感杂录》中展开的“大陆国家”构想相差无几。田中设想的建设“大陆国家日本”不仅成为国防方针的中心，并且作为国家政策规定了以后明治政府的发展道路。

因为田中主张的建设“大陆国家日本”，换言之就是“攻势国防论”和“大陆帝国论”，所以实质上是否

定了以该时期日本海军为中心论述的、应称之为另一种国家构想的“守势国防论”和“岛帝国论”。以田中为首，特别是日本陆军反复强调向大陆开拓发展日本。

根据田中的主张概括形成的“大陆国家日本”这一战略，可以说是积极地采纳了从明治初期到中期舆论界大肆鼓吹的进攻大陆论和扩张主义的结果。

在国防方针中如此规定下来的对华政策，在此后的许多重大事件中都有所表现，包括：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1912年）、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15—1916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郭松龄事件（1925年）、第一次出兵山东（1927年）、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第二次出兵山东（1928年），以及成为中日十五年战争触发点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等，日本的对华政策正是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政治行动付诸实施的。

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以德富苏峰为先驱所提倡的“中日联合论”可谓影响深远，在之后的陆军省新

闻班拟定的《提倡强化国防的本旨》（通称《陆军手册》，1934年10月颁布）就有“日满一体化论”以及“日满支一体化论”，石原完尔（1886—1949）的《东亚联盟论》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中都渗入了这个内容。

这些论述的共同之处就是将侵略事实自我正当化。例如，原作者宫崎正义在书中写到“满洲国”于1932年建国具有“东洋解放以及新建设的道义的、文化的意义”，即代表了这种心态。

进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1937年7月）后盛行的“东亚协同体论”以及三木清（1897—1945）等所提倡的“东亚共同体论”，希望持续构筑与亚洲各国的联合，一方面从正面接受中国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主张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追求新的联合方式。

但是，其真实意图，则是为了继续进行大陆侵略，不是为了克服提倡亚洲联合的矛盾。

1938年（昭和十三年）11月3日，以近卫文麿内阁

的“东亚协同体论”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出台，结果表明，这也只不过是对于日本霸权主义的真实意图加以掩盖的政治手腕罢了。

大概从1940年开始登场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在日美开战一年后，仍是完全看不到以亚洲联合为志向的思想动机，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徒以其完全的伪善性而变得臭名昭著。究其实质，只不过是压制来自被侵略国家的反日斗争，可以说仅仅是日本政客和认同侵略的知识分子们所幻想的一种大东亚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中所蕴含的对朝鲜、中国的不公正且不切实际的认识，今后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和总结。

强者和弱者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想就以下两点再次加以强调：

第一，亚洲论所包含的大陆侵略思想，并不是一

定采用赤裸裸的军事至上主义，反而是避开军事至上主义，而较多地使用了与文明以及文化有关的用语和观点，想要掩盖侵略意图的表述显而易见。

台湾殖民统治所显示的、伊泽修二的国语教育所代表的“同化政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民族自决的趋势出台的朝鲜殖民地统治下的“文化政策”等，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

这种做法弱化了国民对侵略事实的认识，使之反而积极地接受了侵略思想，能够比较容易地被侵略战争的动员所蛊惑。

第二，侵略思想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确定了下来，并从根本上被视为提高日本政治地位的手段。在与欧美列强进行抗争方面，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深感差距悬殊，由此，日本急欲借此在亚洲诸国中获得优势地位，以消除相对于欧美诸国的劣势感。

在深感与欧美对抗力不从心时，表现出对“强者”（欧美列强）的依存和从属，对“弱者”（亚洲诸国）

的侵略和统治。把握这样的对称性（symmetry）虽然十分艰辛，但日本仍努力试图保持“国民”精神上的平衡。为了尽早消除相对于西方列强的劣势感，日本需要对外侵略扩张，这决定了侵略思想的基本构造。作为试图摆脱“威胁”的手段，便简单地依赖于军事主义的体制。可以说这种思想认识一直到战后的今天依然在延续着，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

“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幻想的巨大共同体构想。它试图将日本从“威胁”中解放，却以自己变身为亚洲诸国的“威胁”而告终。而其深植于国民意识中的“威胁”，只要不深刻地反复挖掘有关的历史事实，那么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这一“威胁”仍在不断释放着负面的连锁反应。

“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不仅是一部分军事官僚和右翼言论的口号。由于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创造出一种理论和思想来消除之。

我认为，认识亚洲论中内在的侵略思想，对其进

行剥茧抽丝的理论剖析是必要的。必须将其理论架构和思想渊源作为不断探求的课题。若非如此，就很难产生有效的对抗性的理论，与如今仍在继续散发毒素的侵略思想，以及伴随着新形态表现出来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思想进行抗争。

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大国意识”乃至“帝国意识”，与蕴含着新国家主义要素的各种思潮联结时，带有似乎和以前一样的国防国家主义的色彩，多少有向着新的侵略思想发展的可能性。

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一新兴“大国”视为“威胁”，作为与之对应的措施，一边试图依存于美国，一边准备再次追随军事主义乃至国家主义的潮流，如今不正是处于这么危险的时代吗？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才更需要不断地重新回顾历史，促进自省。

第三章

日本“战败”是败给了谁？

一、战败和投降

“败给了美国”的日本人

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了，这是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那么，日本究竟是败给了谁，具体在何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战败的呢？

战后很多日本人都认为“日本败给了美国”。因为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使日本遭受了人类未曾有过的灾难。所以

一般认为日本是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部队绝对优势的军力面前，被迫投降的。

由于对战败抱有这样的认识，因而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努力从战败的痛苦中挣脱出来。

慑于美国的强大而投降这一看法，一直成为战后日本人对美国的认识。对使日本陷于战败境地的美国倍加向往，而且被认为是促成缔结日美同盟关系的理由。此外，也正是日本由于加强了对美国外向型产业结构，使日本取得了战后的经济发展。

然而，我并不赞同“败给了美国”这种观点。这不是坚决主张日本“不是败给了美国”，也不是说“败给了美国”这种认识完全就是错误的，因为最终确实是因为美国投放了两枚原子弹才迫使日本决策层决定投降，下了“圣断”，这些毕竟都是事实。

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有些东西被忽略了，那就是忽视了迫使日本最终走向战败境地的国家和民族。我在很久之前就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日本是败给了

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我认为意识到这一点的日本人决不在少数。例如，许多从中国战场归来的侵华日军官兵，在谈论与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等共产党军队的战斗时，对事实上的战败体验有真实吐露并有记载。即使没有直接提及战败体验，但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勇猛顽强都坦率地承认。

例如，熊泽京次郎在《天皇的军队》（现代评论社1974年版）中，曾记述了派往中国山东省莱芜县旧寒镇第59师团（通称衣师团）第45大队第一中队的铃木丑之助伍长的证言，讲述的是1944年（昭和十九年）12月，距日本战败8个月前的事情：

进入秋季后到年末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周边的莱芜、鲁西镇、吐系口镇、范家镇等警备队接连被中国军队歼灭。这个旧寒镇的分屯队并不安全。距离皇军据点约300米的对面是中国驻军，近

在咫尺、挎着步枪的中国士兵，简直就像是守卫这边安全的警备兵，从昼间开始一直在那儿走来走去……若是想从中国阵营朝这边攻击的话，大概 10 分钟我们即可全部被歼灭，只是对方不会故意发起攻击罢了。

像这样的证言至今留存下来很多，而这些证言基本的共性就是，虽然体验了战败的事实，但又不愿意坦然承认这样一种不自然的情感。我认为战后日本人总结过去战争的错误就是由此开始的。

在此，正如第二章所介绍的，一般认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对中国的歧视感。也就是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人明显地表现出的中国认识观，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败给中国这样的现实。

因为战败是既定的历史事实，所以要求有正式的投降仪式。但是，战后的日本人对在此所说的究竟败给了谁抱有错误的理解，同时，又将战败和投降混为

一谈。

战败和投降事实上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在回顾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我认为有必要首先将两个事实区分开来重新加以把握，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

其一，战后日本从一开始就将战败和投降混为一谈，对日本究竟败给了谁这一问题没有深入探究。其结果是，从最初总结战争就开始存有误解，从最初就扣错了纽扣。

也就是说，战后许多日本人为了避免再次遭受战败的痛苦，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效仿的样板，以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强大国家为努力目标。由此，战后的日本人选择了像美国那样以大量生产和消费为根本的高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之路。

即使在安定强大的保守政治所支撑的经济成长路线上，“败给了美国”这样的历史总结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就是说，即便是为了完全肯定战后日本的体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败给了美国”这样的总结，是与肯定战后的日本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说，对此加以否定，就会引发从根本上对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式持怀疑态度的立场。

1951年9月8日的旧金山和约，解除了对日本长达6年的占领。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重返国际舞台。而在这之前的6年时间，由于驻留日本的军队几乎都是美国部队这一事实，或许加上当时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又是美国人，由此日本人不加任何怀疑，认定是由于美国参战而战败，得出了投降给美国这一战争结论。

其二，关系到重新把握中日关系。

对于日本败给中国这一事实的争议暂且搁置不谈，事实上战后日本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对亚洲诸国的战争并未记在心中，或者说想要从记忆中将其抹去，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理由是多种多样的。而最主要的是因为不能够

坦然地面对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这一问题。或者说，其中在感情上还依然潜藏着对中国的蔑视。

许多日本老人曾从军参战，体验过侵华战争，他们是中日战争的见证人。但是，他们即使回忆过去的战斗经历和战场体验，对于中日战争究竟是怎样的战争，在认识上也一直抱着暧昧的态度。这或许是由于那是一场惨痛的战争，或是由于加害责任重大，总之，有诸多的原因吧。

一个个战斗中的胜利体验、占领体验成了旧官兵们谈论的适宜话题。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不得不在抑制加害体验以及战斗中的被害体验的矛盾中而战，有的亡命于战场，有的复员返乡。

可以明确的是，一方面是未能彻底取得对中国战争的胜利，最终失败，另一方面是在具体战斗中体验过诸多“胜利”，没有“战败”，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感受。

对于没能体验到彻底胜利而复员的官兵们来说，

虽然没有胜利归来的感觉，但是谈论战败经历的人也是极少的。因为讲述战败的感受，肯定会联系到自己过去的痛苦体验。

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许多人仍幻想着至少是在以亚洲大陆为战场的对中国之战中取得了“胜利”，只是在以西太平洋为战场的对美之战中“败给”了美国，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过去这场战争和进行战争总结。

战争亲历者颇为复杂的这种感情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战争总结，无论到何时都不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我认为，不探究战争究竟是败给谁这一问题，就不能够从战争中汲取教训。

特别是，包括中国战场在内的对亚洲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有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加害责任，才能期待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同时，作为现实问题极其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样的战争总结，对于深入和

正确地认识中国起着阻碍作用。

如今，只有明确地承认“日本败给了中国”这一历史事实，才是正确地总结战争之道。战后如果许多日本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和总结，承认对亚洲战争是侵略战争，亚洲民众的抗日意识和抗日战争是迫使日本战败的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对亚洲人民的看法应该会有所不同，而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的观感也会有所不同。

与日本同属于战败国的德国，自觉地认识到过去的战争是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了对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进行补偿，重返欧洲大家庭，德国努力否定所有的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

许多德国人战后正视由自己参与选举的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所犯下的加害事实，认真正确地对待历史。德国不仅换掉了战前的国旗，整个国家也都发生了变化。

由于这种自省及转变，德国将欧洲各国人民视为自己的朋友。与此相比较，日本却是采取一切方法力图保存战前的权利，虽然尝试对诸军国主义制度进行

改造，却都是极不彻底的。

日本依据“败给了美国”这种战败总结，对战前的日本历史进行了改编。最终，日本不承认“败给”了中国，因而在对中国以及对亚洲的认识上，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日本败给了美国，没有败给中国这一认识，极大地影响了战后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影响到他们对过去那场战争的历史认识，这便导致了狭隘的思想境界。不仅如此，同时也失去了检讨旧观念、树立新的亚洲观的良机。

现在，应该重新将战败的事实和投降的事实分别进行把握，重新反省战后日本人无视或者轻视对华战争、对亚洲战争的状况。

“日本人在亚洲没有朋友”

德国前首相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曾

说过一句话：“日本人在亚洲没有朋友。”这早为众人熟知。施密特痛感德国过去的侵略行径，为了培育与欧洲近邻诸国人民的友情，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日本虽然将亚洲各国视为贸易伙伴，但对于恢复因过去的战争而失去的与亚洲人民的友情，并没有给予关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可以说从根本上错误地总结亚洲太平洋战争是最大的原因。

战败后，日本人把过去的战争称为“太平洋战争”。如前所述，认为日本是在美国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威慑下投降的，其结果是忘却了日本是败给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这一事实。

“是因为美国而投降的”这一观念，使战后日本人心目中产生了过于对美国向往和依存的心态。但是，对战败认识上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后日本人对亚洲的观念。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表现为不能从亚洲侵略战争中充分地汲取教

训的姿态。

第二，对美国过度的依存体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对美从属或者日美同盟的基础。

第三，对于与二战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具有不同性质、却也实属信奉军事合理主义的美国更加认同，“强权即公理”以及“压制论”的意识变得越发显著。

第四，与战前一样，对亚洲的蔑视感依然挥之不去。特别是在中国开始发展和崛起这一新的情况下，所谓“中国威胁论”又掺杂了进来，引发出更加复杂的排他、回归战前的心态。

以上这些，便是使得日本政府及日本人对亚洲认识上扭曲，尤其是不想认真地清算过去的历史问题。不仅如此，甚至仍有人将对亚洲的战争说成是“解放战争”或“正义的战争”。更有甚者，将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反复地自我标榜为对当地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近来，在各种场合都会听到有关历史问题的议论，

令人感到终于将历史问题与评价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这一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现在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批判，努力从中汲取教训的人们，已经开始给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附加上“责任”的言辞，也就是所谓的战争责任论。

但是，绝大多数人即使承认那一历史事实，仍未能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不可逃避的日本近代历史事实而接受。从这样的认识观点出发来看待历史，便常常会对此积极地进行评价，或者有时对其大加称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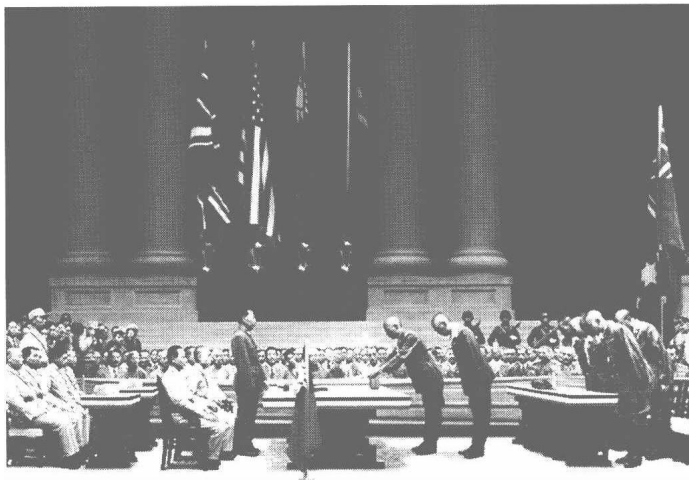
由于仅仅出于称颂而人为地提高其正面价值，拒绝“侵略战争”的用语，美化殖民统治，由此便出现了“亚洲解放战争”、“殖民地有助于近代化”等论调。

为什么对于一个历史事实会产生多样的历史认识呢？是因为历史理解的难度，或者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吗？还是因为日本人将国家灌输给我们的历史铭记于内心，而不能面对真实的历史呢？

一幅油画

在此，想让大家看一幅油画。在本书中这幅画是黑白色的，但不消说，实际的油画是彩色的。这幅油画的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一位名叫陈坚的画家。

题名为《日落·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的油



《日落·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

画，极其忠实地再现了被派往中国的日军（当时，叫支那派遣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在投降签字仪式上的情形。

出席投降仪式的日方代表有当时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中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大将、台湾派遣军参谋长泽山春树中将、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昌雄中将，共7人。画面右侧靠近中央的两个人，后面的是冈村，前边的是福田。

与此相对的画面左侧站立着的是中方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何应钦是被通称为“梅津·何应钦协定”的《塘沽协定》的中方代表。何将军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时，担任讨共司令，与汪精卫共谋打倒蒋介石。但是后来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被视为亲日派的将军。

1945年9月9日进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是在位

于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市黄埔路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进行的。这里曾经是1929年3月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至1970年为止一直用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校舍。

画家陈坚根据在重庆发行的《大公报》（1945年9月10日）中的“日军签字投降一幕”为题的报道而创作了这幅油画。正如这幅油画所描绘的那样，盟军诸国的代表、新闻记者以及市民数百人坐在旁听席上，见证着这场签字仪式。现在，陈坚此画所参照的数张签字仪式的照片在网上还可以看到。

被派往外地的日本军在派驻的当地，应该分别到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被就地解除武装。但是，对战后许多日本人来说，铭刻于心的应该是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的投降签字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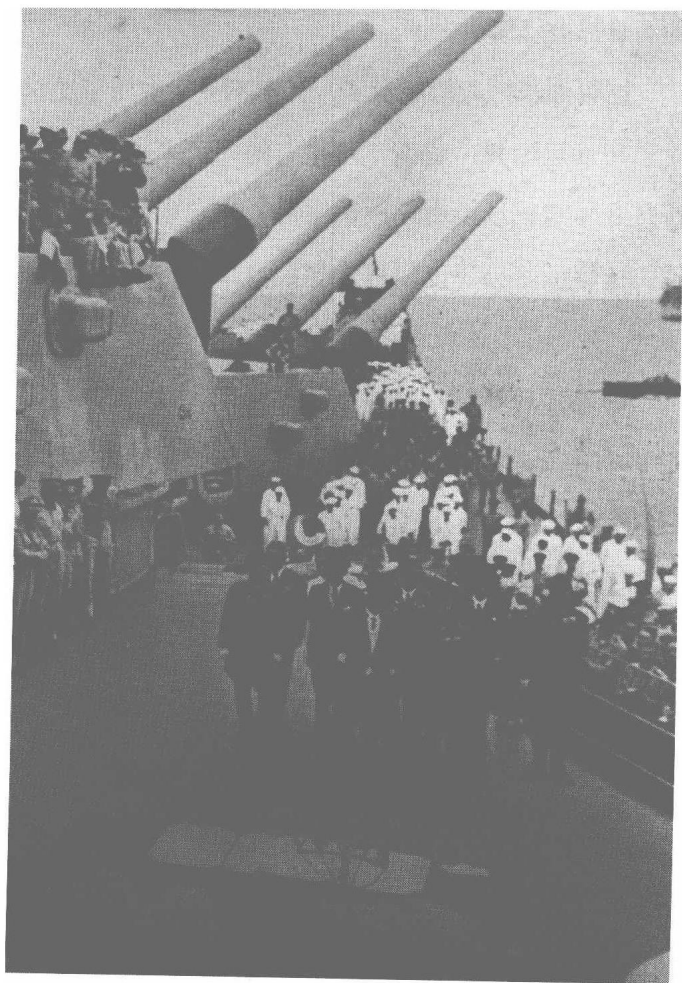
也许是这一原因，日本民众大多认为日本是向盟国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投降的，这一印象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极其强烈。在以美军为中心的盟国代表面前进

行投降签字仪式，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另一个历史事实，在战争最激烈时期日本派兵多达 196 万的中国的首都南京，的确也进行了日本军队投降的签字仪式，正式地承认向中方投降。

1945 年 9 月 9 日在中国南京的投降仪式虽然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但是这张油画所展示的向中国投降的签字仪式的现场照片，很长时间在日本人中间并没有被公开。这是出于何种意图呢？还是资料公开迟缓拖延呢？对此无从知晓。

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战后许多日本人并非想从正面来面对这幅画所展现的事实，即日本向中国军队投降的这一历史事实。

不仅是在中国的投降签字仪式被忽略了，在过去被日本侵略过的诸亚洲地区进行的投降签字仪式的情景都并没有被纳入视野。给日本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只有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的投降签字仪式的场景，而在中国南京的投降仪式、在亚洲各地进行的投降仪式



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的投降签字仪式

的场景都被模糊淡化了。

这幅油画向人们展示了，日本不只是败给了美国。对于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的人民来说，以及期盼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台湾和朝鲜的人民来说，这幅油画会使他们再次想起日军最终被逼进投降境地，败给了日本派兵最多的中国。

的确，现场照片的冲击效果强烈，通过视觉和感觉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战后，密苏里号上投降签字仪式的照片在许多场合被反复地引用。国内外出版的许多著作的封面都使用了这张照片，而用作插图的更是不胜枚举。

虽说投降签字仪式有盟国各个国家的代表列席，但是那是在象征美国巨大战斗力的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在战舰的乘员以及记者们的注视之下进行的投降签字仪式。在此所上演的一幕，是强调由于盟国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的场面。

与此相对，在中国的投降签字仪式，从油画中可

以看出整体上笼罩在一种凛然的气氛中，令人感到某种庄严。被迫遭受战争、蒙受巨大灾难的中国方面的要人，以及注视这一场面的中国民众，表现出毅然决然的态度。

陈坚的油画以及上传到网上的有关照片，像这样的历史史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和确认，日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战败以至投降的呢？

战后日本人不愿意承认败给中国，其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在此，通过对近代日本国家形成时期的中日关系史进行分析，再次来确认一下其中所表露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念。

我认为，不承认和不愿意承认败给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信息量的多少及其质量高低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大多数的日本人所固有的对中国的认识，或者是在近代中日关系史方面存在错误的认识。

中日之战是从何时开始的？

如果追溯日本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历史经过，就要面对应该如何确认战争起点的问题。近代的中日紧张关系是从日本出兵台湾开始的，但是在此，笔者想将日本向中国境内派驻军队的义和团事件作为侵略中国的起点来加以探讨。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面临被欧美列强瓜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加之清朝政府为了向日本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需增加税收等，极大地加重了民众负担，导致民众对政府的反抗达到了极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结成了以宗教为媒介的秘密社团组织，开始对抗政府。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名为“义和团”的组织。

义和团在日益陷入混乱的清帝国内，向以传教和谋利为目的的外籍人士及其买办不断地发动袭击。

清朝统治者也暗中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抵制西洋列

强的势力，希望能够阻止外国势力强行侵入中国。日本桂太郎首相将此视为“应该掌握未来东洋霸权的开端”（《桂太郎自传》卷三，平凡社1993年版），认为这是向清帝国进行势力扩张的绝好机会。

1900年7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向清帝国派一个师团（约2.2万人）的兵力。当时，因为列强联军的兵力为4.7万人，日本派兵的数量大概相当于联军一半的兵力。

翌年9月7日，清政府与联军签署了“最终议定书”，同意支付4.5亿两白银的赔偿金，同意以保卫公使馆和铁路干线为由各国军队的驻兵权。

根据这一驻兵权，日本向中国派遣了驻军。正是这一驻军，之后成为了中日战争的主力部队。所以，日本以义和团事件为借口向中国派驻兵力，可以视为发起中日战争的远因。

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列强，乘清朝国内混乱之机，加紧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试图通过军队扩大在中国

的利权。列强的这种侵略行径，是毫无正当性可言的。

通过动用武力获取的驻兵权，是侵害主权的行爲，是侵略行爲。中国被迫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争夺的牺牲品。

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事件为主要起因，中国国内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国内的一些势力派别，有不少通过依附于列强来努力保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另外，对于欧美列强来说，中国陷入缺少统一政令的无政府状态，也正是其权利扩张的大好时机。

日本和西方列强加剧了中国的内战，并使中国的形势朝着“国际内战”演变。在中国获得权益这一点上，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日本，开始将中国的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后更是积极地寻求进入中国的机会。

这样的良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降临了。日本为了夺占德国的租借地青岛，袭击了有德国基地设施的威海卫，攻占了威海卫并据为已有。1915年1月18

日，大隈重信内阁的外交大臣加藤高明，又以强硬的态度向中国政府提出“五号二十一条要求”。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无理要求。其中内容包括：第一号，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第二号，接受日本对满洲及东部蒙古的统治权；第三号，将拥有众多矿山开采权的汉冶萍公司这一中国企业改为中日合作经营；第四号，不割让或不租借中国沿海及其岛屿的协定；第五号，聘请日本人为中央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

总之，企图夺占德国在中国的一应权利，掌握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权，事实上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侵犯中国的主权，并试图从制度上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些内容极大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对于这种过分要求，甚至美国和英国等也提出了抗议。

当时担任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的周自齐，针对日方要求，于1915年（大正四年）7月5日发表谈话，批评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但是，在日本以军事威胁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迫不得已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屈辱的“五号二十一条要求”激怒了中国民众，成为反日运动激化的一大原因。自此以后，中国民众将日本视为比欧美列强更凶暴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做发泄愤懑的靶子，对日本的反感随之增强。

虽然遭受欧美列强的压迫，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混乱的状态，但民众很少有一个明确表达愤怒的目



在济南事件纪念碑前（笔者摄于2007年9月23日）

标。现在这个目标出现了，中国民众高喊抵制日货、排斥日本商品等口号，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反日民族情绪高涨。

不顾中国民众的抗议行动，日本从山东半岛到济南，开拓了通向华北地区的通道。这是与此后出兵山东（第一次出兵为1927年5月28日，第二次出兵为1928年4月19日）和济南事件（1928年5月8日）有关的对中国真正的侵略。

侵华的理由

大隈重信内阁以强硬的态度提出无理要求，甚至无视英美的抗议而强行实施，有着日本国内的原因。当时，日本的外债超过20亿日元，陷入财政恶化的境地。饱受经济困苦的国内民众对日本政府非常不满，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大隈重信内阁想要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大陆，

并通过扩大在中国大陆的权利，为日本谋取利益。同时，为了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局，极其希望中国加速市场化。在这种急需寻求资本以及国内民众对生活严重不满的背景下，大隈重信内阁遂强行采取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并且，对于日本来说，那时正是西方列强因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亚洲无暇顾及的有利时机。但是，就像在失火现场行窃的小偷一样的日本的卑劣举止，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乃至亚洲诸国人民的唾弃，同时也为全世界所蔑视。

日本在成功地获得了在中国的權利后，对中国的贪婪之手就越伸越长。除了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夺占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青岛和威海卫以外，又乘势挑起了济南事件，出兵山东；之后又由炸死张作霖事件引发九一八事变，以及上海事变等等，接连不断地以军事武力展开对中国的压制。

导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件，将长久以

来所积累的军事压力推向了顶点。

追溯历史，义和团事件（1899年3月在山东兴起）的结果，是中国与各国政府之间交换了“义和团事件最终议定书”（1901年9月7日，中国称之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首都北平的驻兵权。这之后日本又寻求各种借口，不断增扩驻军兵力。

派驻军队的一部分，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中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发展为全面的中日战争。虽说驻军是依据国际议定书的承认，但是，以向中国军队挑衅、试图挑起战端为目的的重复不断的演习，应该说是卢沟桥事件的主要原因。

将时空转换到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应不是什么问题，现在的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也总是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是，当时的日本和中国事实上处于“敌对的关系”。

现在的日美及日韩关系，是同盟关系，或者是友好

国。美国驻军通过演习而转向战争的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对此日本和韩国都是能够充分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从当时的中国民众角度来看，具有“敌对关系”的日本军队驻扎，且不断地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他们对此所表现出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

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以及陆军总部与北平的日本驻军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因为非常明显，围绕对该事件的处理，政府内部极其混乱，作出了某些临时凑合的决策。

日本政府以及日本陆海军的首脑们，对于在中国引发战争对中国境内的日本企业（即所谓的在华纺织等）带来的危害程度没有明确考虑。在日本国内存在着多种势力，对于从打入中国经济市场到完全转向军事侵略表现出犹豫不决。由此，便只是紧急出台了应对该单一事态的政策，其结果表现为不断地增派日军前往。

在此情况下，抱着急欲寻求资本、消解国内民众困苦这样的目的而扩大对华战争的主张，在日本国内

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军部得势并开始了积极的行动，先前出现的一些不同观点被暂时淹没了，或拖延搁置了下来。

可以说，日本国内不安分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强人，最终引发了缺乏战略的侵略战争。因此，这种混乱和不安也蔓延到出征士兵身上，表现为在中国各地频繁地发生日军士兵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残虐行为的典型事例。

从中国方面来看，1937年2月10日实现了国共合作。但是，在中国国民党内依然有一部分势力，对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犹豫不决。可以说，蒋介石就是其代表。

中国方面与侵华日军的战斗在初期表现得不够坚决果断，其原因也在于此。对于蒋介石来说，首要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日军。由于蒋介石曾与日本有一系列的停战交涉等妥协姿态，因而成为直到现在仍受到批判的原因。

二、中日战争以后

侵华日军干了些什么？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大批的中国民众和在华日侨被卷入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发生的激战之中。

例如，相继发生了1937年7月26日的广安门事件和7月29日的通州事件。尤其是后一个事件中，有200多名日本侨民丧命。

日本国内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渲染，煽动了报复中国的民间情绪。对于想真正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的日军士兵来说，这样的事件是煽动其敌视中国的极好素材。

但是，按照国际法，如果日本侨民遭到杀害，正如当时所通行的那样，向中国政府抗议，要求中国方面谢罪和补偿是正当行为。至于侨民为什么在中国居住则另当别论，这些日本平民成为“受害者”则是事实。

但是，仅仅强调这一点，将日本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视为正当则是极其荒唐的。因为事件发生的远因，是日本侵犯中国的主权在先，并不断倚仗武力试图扩张在华权利，日方的这些企图和做法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日本政府及媒体对事件大肆报道，加强反华宣传，事实上也是利用这一手段来掩盖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日本政府担心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另外，特别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关系恶化，没有向中国发出宣战通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之后，中日之间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事件，是日本对中国观念露骨的展现和表演。南京事件是在南京城内外发生的侵华日军大量虐杀中国人的事件。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明，该事件夺走了约30万中国人无辜的生命。

的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民众间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反日情绪又刺激日本军人的气

焰，导致侵华日军大量残害无辜民众这种暴行。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是典型的残暴虐杀行为。

可以说，南京事件是概括了日本对中国侵略本质的典型事件。南京事件显示了日本军队以及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又是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这一历史事件将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中。

在近代以前，日本的政治、文化等以中国为典范，对中国怀有敬畏感。后来抛弃了对中国的敬畏，而将中国作为压制的对象，将中国视为有利于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市场，以及巨大的权益扩张之地。

军部的激进派以及标榜国家主义的各种右翼团体首先作出了愚蠢的判断。之后，古河、大仓等新兴财阀，以及三井、三菱等旧财阀跟随而至。党派政客革新官僚，或者被称为新官僚的一批人在联结军部和财阀之间起着积极作用。

可以说，侵略中国是在军部、财界、官僚政客三位一体的指导下强行推进的，进而煽动国民舆论，实

施战争动员。

由于卢沟桥事件（中国称其为七七事变）真正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即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想进行和平谈判，也已经无法挽回了。

至此，由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即使是曾对日方持融合姿态的蒋介石，也坚持表示，只要日本不先从中国完全撤出、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并表示谢罪的话，他将拒绝接受任何和平提案。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公之于世，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深陷苦恼之中的蒋介石的立场。

假如这些条件没满足而接受和平提案的话，它必将会危及蒋介石的地位，也势必导致国共合作失败。另外，南京事件的真相已在中国国内传开，加重了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并通过驻南京的国际红十字会以及一些主要国家的媒体向全世界传达，由此国际社会也进一步失去了对日本的信赖。

没能充分把握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这些动向的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不能够理解中国进行彻底抗战的决心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日本媒体报道的日本取得“连战连胜”，以及有关“中国政府的暴虐”的报道，只能不断地激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仇视和愤慨。

当然，从日本方面来看，对于不接受日本的和平交涉提案的中国政府，很多人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虽然站在加害和侵略的立场，但是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所以，只是针对中国方面的不当行为一味地指责和攻击，而对自身的不当行为却视而不见。

将自身置于封闭环境中的侵略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非正义行为呢，还是在有意地回避或掩饰，抑或是只想要过度地主张自己所认为的“正义”？随着深入细致地探讨日本对华战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更能感到对中国发动的侵略，在夺取了大量中国人生

命的同时，也使日本人变得意识不明、思想迟钝。

中日战争如同其名称所示，是两国间的“战争”，当然也背负着当时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秩序重组这样的课题。日本侵略中国，可以说是国内各种势力为实现宿愿而发起的，那就是想要寻求对中国大陆实行霸权统治，获得日本资本主义的权益，并且预测到将会对形成新的亚洲秩序产生巨大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与日本抱有同样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中国大陆是确保自身权益、获取利益的宝地。在这方面，欧美列强和日本的获利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中国一直被视为欧美列强和日本发生对立和冲突的必争之地。这就是列强之间平时相互牵制妥协、有时又进行恫吓威胁的原因。

在此意义上来看，诸如围绕中国问题所签署的日英同盟协约（1902年1月30日）、日俄协商（1904年8月22日），或者桂太郎—塔夫特备忘录（1905年7月19日达成）等，都是日本与英国、俄

罗斯、美国之间的争斗与妥协的产物。

进入 20 世纪，列强之间围绕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诸国的霸权之争，其攻防争斗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和激烈。在此，有必要追溯历史，对中日全面战争以前的时代加以回顾。

战前的世界秩序

从开始中日全面战争到对英美开战，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动向和国际政治形势是怎样的呢？在此作一简要回顾。

试图确保在中国大陆所获得的权益的美国，在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开始抱有警戒之心，1897 年就地制定了对日作战计划，通称为“橙色计划”。

进而，针对在日俄战争中艰难取胜的日本的扩张态势，采取应对措施。1904 年，根据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总统的命令，在

陆海军联合会议上制定了新的“橙色计划”（War Plan Orange）。在该计划中，将日本作为假想的敌国，纳入长期的战略目标。

美国一方面致力于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展示军事威力，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政策。制定美国的长期战略，对于同样是军事国家的美国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一国的军队一定会以假想的敌国为目标，不断地进行军备扩充。

日本陆军省也于1907年（明治四十年）4月19日，批准了《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帝国军用兵纲领》，开始每年制定国防计划。同时，日本海军将美国设定为第一敌国，为日美开战做准备（日本陆军则将俄罗斯以及后来的苏联作为第一假想敌国）。

日美两国在同一时期彼此将对方作为假想敌国，形成相互提防的关系。之后，日本海军详细调查美国海军力量，并不断扩充军备。

进入20世纪之后，日美两国为了在中国争夺霸权，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明显增加。而美国与在中国已经确定了势力范围的英国和法国相比较，属于后到的入侵者，其企图侵入的地区也包括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由此，将来与日本的冲突更是难以避免。

虽说日本陆军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十分明显将有可能与俄罗斯再次开战。故而在俄罗斯革命（1917年11月7日）以后，开始计划攻打社会主义苏联和占领西伯利亚。为此，在中国确立霸权成为必要的条件。

日本海军在象征日本海海战的日俄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由此傲慢自负、得意忘形，开始展望将来通过与美国的战争来决定在亚洲地区的海上霸权。

日本陆海军通过在中国确立其霸权来加强自身的地位，显示本国的强大。同时，日本陆海军在向中国发起军事入侵的过程中，相互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地上演。其中达到的一个顶点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

月 18 日)。

日本海军像是在与由于九一八事变而在国内名声大噪的陆军相对抗，于翌年（1932 年）1 月 28 日发动了上海事变。1937 年 7 月在卢沟桥事件中日本陆军与中国军队进入战争状态，而日本海军也于 8 月 13 日向上海出动陆战队，与中国军队交战（第二次上海事变）。

日本一面试图抵制英国、法国、美国等向中国的入侵，一面以舆论引导国内各势力之间的竞争关系，为实现围绕中国的亚洲秩序的解体和重组而不遗余力。

此时的中国不仅成为列强间的争夺对象，同时在其国内，众多势力也各自强调自己的地位，极力建立强化自身力量的组织体系。日本国内的媒体和舆论，大肆宣传报道陆海军在中国的“积极”表现，煽动舆论，激发国民的反华情绪。其结果是赢得一般民众对陆海军侵略中国的称赞和拥护。

在此，对于侵犯主权国家中国的非正义行径没有

任何的指责，这么说并不过分。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通过侵略和压制中国，将带来日本在大陆的“发展”。由此，在国内形成这样的舆论，就是决不能容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阻碍日本“发展”的行为。

国际联盟采纳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判定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的“自卫行动”，由此，日本政府通告国际联盟退出国联。从当时国内的背景来看，日本国内媒体具有上述舆论导向上的错误。

想要完全压制中国，又想逃避来自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国际联盟方面的制裁，日本政府的这种姿态，发展到后来便引发了对英美开战。由此也可以说，作为中日战争的延续，发生了后来的对英美的战争。

可是也应看到，在列强围绕中国进行激烈的霸权争夺中，与此课题相关，在日本国内，从1920年以后即存在着两种思潮。

在1921年11月12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九国条约，是欧美列强想联合阻止日本对中国进行过

度入侵的条约。根据华盛顿会议，明确了被称为华盛顿体制的新秩序，即亚洲的秩序由美国和英国为中心来决定。

针对由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在亚洲地区以英美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所谓华盛顿体制），在当时的日本国内，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两种思潮或路线的对立。

一种是接受华盛顿体制，采取亲英美的姿态，期待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亲英美的协调主义路线。另一种是坚持构筑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势力，即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路线。

亚洲门罗主义路线是以曾经采取孤立政策，努力排除欧洲诸国对美国的干涉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的名字命名的。作为显示日本军部对外方针的用语，是由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江口圭一首先采用的。（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青木书店1998年版）

围绕这两种路线的变化动向，对后来的日本军事、

外交方针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国际和平、民族自立这种国际政治的基本方针也影响到日本，在此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拥护亲英美协调主义路线的势力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国内的大正民主主义形势下，政党政治得以展开。

当时，由三井和三菱等旧财阀支持的政党，希望在尽可能不依靠武力的情况下来寻求确保中国市场。在此情况下，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选择亲英美协调主义路线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事实，意味着日本资本主义依存于英美。但是，以自立的日本帝国为目标采取亚洲门罗主义路线的势力，始终没有接受这一选择。日本驻外军队关东军的激进派军官所发起的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以军部和右翼为中心的亚洲门罗主义势力断然实施的“国外武装政变”，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日本帝国对英美的从属，以促进日本作为自立帝国的发展。

这样一来，两条路线的对立变得日益尖锐。坚持亚洲门罗主义路线的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匆匆地在中国东北部地区建立了“满洲国”（后称满洲帝国），使之独立于中国，并将其成功地建成为日本帝国的实验基地。

“满洲国”（中国称之为“伪满洲国”）背后的日本支持者中，包括了东条英机所代表的、标榜亚洲门罗主义路线的陆军统治派军人，岸信介所代表的革新官僚，以及颇具势力的新兴财阀鲇川义介统率的日本产业股份公司（战后的日产）等，军阀、官僚、财阀携手构筑了“总体战国家”的政治体制。

1941年10月14日，东条英机组阁，启用岸信介担任副总理级的商工大臣，成为被称为“满洲内阁”的组阁。在东条英机政权中担任要职的多是一些军部、官僚、财界出身的人，他们都拥护和支持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实施所构想的“总体战国家”。

东条英机“满洲内阁”的实现，是坚持以亚洲门罗主义势力的“总体战国家”构筑为目标的内阁。当然，并没有因为东条英机内阁的成立，就完全清除亲英美协调主义路线的势力。昭和天皇对将日本的对外路线仅仅委托于亚洲门罗主义势力的主张，依然是踌躇不决。

未抛弃向来的对亲英美派的同情，在对英美开战的情况下，从未抱有胜利确信的天皇，对采取与英美彻底决裂的策略尚不能决断。

美苏和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不宣而战。在这一点上按照国际法，美国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均可提供一定的物资，与日本之间是以贸易的形式，积极开展物资流通。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到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止，美日之间一直进行着贸易往

来。最后，虽然中止了钢铁和石油这样的战略物资贸易，但是在中日战争开始后大约4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一般的贸易交流。

另一方面，美国向中国派遣了志愿军（正式名称为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 AVG）。也就是说，美国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日战争。志愿军主要由航空兵编成，中国人称之为飞虎队。从美国国内39个州招募的志愿人员，组成了由近百名飞行员为中心的志愿航空队阵容。

不仅是美国，在抗击日军的重庆轰炸中，苏联空军士兵也作为志愿军加入了中国空军共同作战。对美国来说，当时日本是重要的贸易国，而苏联与日本缔结有互不侵犯条约。在此情况下若要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话，不得不采取志愿军的形式。

在朝鲜战争之时，为支援朝鲜，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派遣了近百万战斗人员，奔赴朝鲜战场。

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为

确保在中国的权益竞相奔走。在利益争夺的过程中，列强之间在中国的舞台上不断展开争斗，对此，应该从整体视角来把握。

谁先谁后的问题，是次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欧美列强和日本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牺牲，使中国的基础设施遭受破坏，中国沦为殖民地市场，可以说这些是极其重大的问题。

中日战争绝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针对日本的侵略，从最初就表现为毫不妥协，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向苏联共产党等寻求援助。

另一方面，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以江浙财阀等民族资本家为后盾的，可以说是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体制。苏联不仅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就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而且向国民党也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从侧面支援了北伐战争。在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事实上处于内战状态。

但是，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一贯采取消灭共产党的方针，蒋介石对共产党反复进行了五次歼灭扫荡。中国共产党于1934年4月10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翌年8月1日，发布了有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形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2月9日发生的反对日本对华北分离运动的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也是具体的表现。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出现这样一些抗日动向，另一方面，日本的广田弘毅内阁受到由于“二二六”事件而势力大增的军部的压制，结果便是1936年8月制定了《第二次北支处理纲要》，更加鲜明地表露了向中国华北地区实施军事入侵的扩张野心。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没有响应这一倡议，一味地坚持对抗，执意打垮共产党。

迈向达成国共合作的路程绝不是平坦的。努力实现国共合作，是在经历了 1937 年的卢沟桥事件中日两国军队的冲突，以及同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同周恩来会谈之后（庐山会谈）。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确立是在同年 9 月 23 日。

历经迂回曲折，中国民众开始在两个党派领导动员之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其他国家也向两党提供了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援助。

例如，苏联于 1938 年提供了 1 亿美元的对华借款，1941 年签订了 1.5 亿美元的借款合同，以及提供 1.4 亿美元军需物资的契约。另外据记载，苏联的军事专家 3665 人参与了中国的对日作战。

这期间，在南京陷落后，中国空军抗击日本军机对临时首都重庆进行的狂轰滥炸，来自美国以及苏联的志愿飞行员也参与了对日空战。前面所介绍的飞虎队，到 1942 年 7 月 3 日解散为止，据统计共击毁日本军机 296 架，导致日本航空官兵约 1000 人丧生。

总之，所谓中日战争，从仅仅是两国间的战争，演变成为苏联和美国也卷入其间的战争。尽管在早期并无别国正规军的增援，但中国绝不是在处于国际孤立的状态下抵抗日本入侵的，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构筑了大大小小的挫败日本侵略的抗日战线。

不管苏联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意图如何，也不管想要在战后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的如何打算，美苏两国已联手通过军事支援来压制和排除企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两国拥有共同的认识。

日本战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陷入了内战，最终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期望如愿地实现了。

但是，这只不过是事后附加的历史解释。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的抗日决心，这种决心和意志，可以说是源自以誓死抵抗日本侵略为号召的极大的抗日民族热情。

是“胜利”，还是“战败”？

在论述中日战争时，派往中国的日军，且不论小规模的战斗胜败如何，在正规战斗中大多取得了胜利，由此经常宣称“日本军队取得了胜利”。

1938年10月27日，中国的军事要地武汉三镇被日军占领，这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危机。然而包括前面的南京陷落和首都迁移这些危机，事实上也成为了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一大契机。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1937年7月7日）以后，没有马上发展为大规模的战斗，而是持续着互相对峙的状态。两军动向出现明显变化是在1938年4月7日大本营发动的徐州作战（同年5月19日占领了徐州）。

日本方面为准备这次战役动员了约30万大军，展开了击溃中国主力部队的作战。虽然成功地攻占了武汉三镇，但在试图击溃中国主力部队的战斗中失败。由于所谓战术的胜利和战略的失败，预测两军的战斗

将变得长期化。

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已经有 23 个师团（约 70 万人），在满洲、朝鲜有 9 个师团，日本国内仅剩下近卫师团，不可能再投入更多的兵力。

到武汉三镇陷落为止，中国的主要城市以及铁道等主要基础设施已被日军占领，但进一步向内地推进则极为困难。两军的作战完全处于胶着状态。

之后，日本陆海军向新首都重庆进行战略轰炸，实为不加区别的狂轰滥炸，使大量无辜的重庆市民死于残暴的空袭。但这仍未能摧垮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反而只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

有关重庆轰炸的实际状况，前田哲男通过到实地取材和收集证言写下了《战略轰炸的思想——格尔尼卡、重庆、广岛》（凯风社 2006 年版），书中这样写道：

南京陷落后，从 1938 年（昭和十三年）12 月 25 日开始，日军对中国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实施

了不加区别的狂轰滥炸。

诚然，空袭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空袭造成很多人死于非命，而持续的轰炸使人精疲力竭。但是物质上的巨大破坏并不一定能击垮人的精神和挫败人的战斗意志。在拍摄的侦察照片上所观察不到的重庆市民的抗日意志，相反变得愈加高涨。日军企图将居民对空袭产生的恐惧心理，向厌战、屈服方面引导，但是，正如埃德加·斯诺的报道中所提到的，重庆的人民选择了誓死抵抗。

由此，中日双方进入了所谓持久战的阶段。徐州作战以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日军勉强维持已经取得的占领地区，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展开新的进攻作战的战斗力。

之后，中国军队和中国民众在各地展开了游击战，通过小规模战斗对日军进行长期的消耗战。这期间日军迫不得已分派兵力以对付游击战。同时，在日军内

部，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蔓延，发生了许多对上司发泄不满的暴力事件。

例如，1942年（昭和十七年）10月15日，驻守在中国湖北省广水镇的辎重兵第三联队第一中队的7名下级军官对将团军官施行暴力行为的广水镇事件，同年12月7日，驻扎在山东省馆陶县的独立步兵第四十二大队第五中队的6名士兵袭击军官的馆陶县事件等，不胜枚举。

从军队方面来看，这些事件所表现出的作风和军纪的混乱，作为日军从内部崩溃的征兆而引发了极大的危机。由此，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改订的《步兵操典》中不得不写入“军纪的张弛关系到军队的命运”。

在这一意义上讲，不存在“日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或者“连战连胜”的事实。真实情况是，在联合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背景下，中国民众以高涨的抗日热情坚持抗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兵力，同时也消耗了日本的国力，致使日本一步步地走向战败之路。

虽然也承认对中国战争战败的事实，但是，事实上在日本国内依然存在这样的议论，即日本发动的这场对华战争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作为其解释的理由，频繁地引用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如下的讲话。

1951年5月3日，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外交共同委员会上，麦克阿瑟发言称：“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在过去的百年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得以强大”，“日本介入战争的动机，大部分是迫于安全保障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也主张中日战争是“防共战争”。（小堀桂一郎编：《东京审判日本的辩白》，讲谈社1995年版）

对此，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麦克阿瑟是一个持什么样思想观点的人？另外，发表这一讲话的1951年又是怎样的时代背景？

麦克阿瑟曾历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是有名的反共产主义者。从国际形势上看，在这之前的1950年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发动进攻，眼看就要全面占领朝鲜半岛之际，朝鲜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援。另外，在中国国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内战刚刚结束。

战后，美国将中国视为进出亚洲的据点，并开始将日本作为新的反共防洪堤来重新认识。

麦克阿瑟的发言，露骨地表现出想要将日本转换为一个担当美国反共政策旗手的用心。

从麦克阿瑟发言的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即重新考虑所谓的民主化政策，这是战后日本和日美关系反共化的开始。

1951 年 9 月 8 日，在旧金山和会上允许日本重返国际舞台。同时，日本与美国之间缔结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其结果是，日本成为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可以说，从“民主国家”到“反共国家”的转换是由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方针决定的。

从这一视角来看，通过中日战争的日本战败，以

及之后中国国内陷入内战这一事态，日本作为反共国家重新开始行动。

日本的这种动向，也可以说是针对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中国登场的直接反应。由此，中日战争中日本败给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被置于脑后。

也就是说，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本应该追究使之遭受巨大灾难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但是由于国内持续内战，国家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不能从容地去考虑这些问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到社会主义势力圈中，而败走台湾的蒋介石则以中华民国的重建为第一目标。

在冷战体制中，美国向蒋介石领导的台湾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从而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台湾在依靠美国援助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向日本追究战争责任的机会。

由于日本战败后包括中国的亚洲环境的新变化，

除了东京审判，战后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没有被追究和反省有关战争责任的问题。

没有追究过去的战争责任，使得许多日本人对侵略责任和殖民地责任表现出意识淡薄。

美国的罪与罚

可以认为决定战后日本政治架构的反共化，是依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象征的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这并不是以战前日本复古排外的保守主义，而是以所谓的美国式民主主义来粉饰的战后型保守主义为基调。

由于中日战争中日本败给了中国，有机会对战前复古排外的保守主义以及依此为基础的军国主义进行清算。但是，由于中国的内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美国将清算日本保守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机会给搁置了起来。

延续至今的所谓日美安保体制，长期剥夺了日本

反省战争、确认败给中国的历史事实的机会，可以说在这种体制下，过去的战争是“败给了美国”这一错误的历史事实一直深植于日本人的意识中。

对此进行有意规划的美国并不想改变对日政策。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昭和天皇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会见合影

时，麦克阿瑟向来的反共思想即变成为对日占领政策中的各项政策。

实际上美国政府本身也拥有完全相同的观点。1948年1月6日，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884—1972）政府的陆军总参谋长乔治·C. 马歇尔主张，将日本作为“反共防洪堤国家”。毫无疑问，包括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在内，美国的战后亚洲战略就是为了阻止苏联的影响力，在日本防止亚洲共产化，并将其作为反共攻势的据点。

第四章

日本是“败给”中国、“投降”于美国吗？

一、战败的不同表现

成长的背后

所谓亚洲太平洋战争，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是为谁而战的一场战争呢？同时，从这场战争中可以汲取怎样的教训呢？

这是战后不断地被提起的问题。但是，对日本究竟败给了谁这个问题，一直是避免作出回答。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文书中，确实写有日本无条件地向美国、

英国、苏联和中国等诸同盟国家投降。

暂不提“日本战败”这一历史事实，在此想指出的是存在于战后日本人意识中的“败给了谁”这一问题。

恐怕大多数日本人持有难以改变的认识，即认为日本战败最终是由于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是败给了美国。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尽管不能说完全是按照所期待的进行的，但也是任由胜利者美国的强大气势来推进。此外，日本正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才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并且迅速地走上了经济大国之路。

战后的日本由于追随迫使日本战败的美国，从军事上的“败者”，变身为经济上的“胜者”。从战败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在成为“胜者”的过程中，战后许多日本人对于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究竟“败给了谁”这一问题显得漠不关心。

即便如此，如果要问起“日本败给了谁”这样的

问题，也许大多数的日本人会回答说：“日本是败给了美国。”但是，我对这样的回答以及同样的论调，无论如何也难以赞同。

我的回答是：“日本败给了中国，却是向美国投降的。”这个回答包含了象征性的意思。历史事实是，日本败给了所有同盟国，是同时向他们宣布投降的。

我认为，战后日本人开始过度地崇尚美国的倾向，是得出“败给了美国”这一战败总结的原因。

日本与美国成为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的确，战败后日本长达6年处在联合国军占领下，至1951年旧金山和会才解除了占领而恢复独立。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日本被更深地纳入了美国的阵营。

为了不再遭受第二次战败，与美国缔结安保条约，保持事实上的同盟关系，成为战后日本保守派的基本外交路线。这个安保条约的确是依据美国的亚洲战略缔结的，但是，日本积极地接受了这一条约，不仅是

因为从经济上可以获得极大利益，也是出于战后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判断。

由于该安保条约，日本人从亚洲脱离开来，向美国靠拢，由此抹杀了战败的记忆。坦率地说，由于对投降对手大加颂扬，日本“成功地”从战败的创伤中挣脱了出来。并且，为了确保继续“成功”地发展，构筑了安保体制，即明显地形成了所谓强调日美同盟路线的日本战后的体制。

高速的经济发展使日本确立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对过去不屑一顾，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历史认识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战后日本人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忘记了面对过去，失却了反省的机会。

事实上，自从占领期开始，依据由美国独家支配的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指令，形成了日本战后国家的基本框架。本来必须由日本国民独自进行的战争总结，也受到了某种外力的制约。比如，将过去的战

争命名为“太平洋战争”，日本发动战争的战场，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而成为了西太平洋海上的岛屿。因此，战争的敌方也不是亚洲诸国人民，而是美国以及美国的士兵。由于日美同盟，在战后日本人的意识中形成了极其扭曲的历史认识。

138 万兵力，415 亿军费

战争总结给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谁都知道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以日本战败而告终的。但是究竟是如何总结这一战败的呢？我认为，由此产生的认识上的错误，严重阻碍了加深历史认识，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错误。

再次指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过去的战争是败给了美国。的确，日本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The Potsdam Declaration)，向盟国军队无条件地投降，事实上是向盟军的主力美国投降的。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日本是在对亚洲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战争中战败了。也就是说，日本战败，根本上是由持续不断的所谓“中日十五年战争”（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长期战争所决定的。

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可以通过具体数字来加以说明。统计数据出自第一复员局编著的资料，题为《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期间动员外史》（同名不二出版，1988年作为《十五年战争机密资料》之一复刊）。

据资料记载，1941年，包括中国东北、中国关内地区，投入到中国本土的日本陆军兵力约为138万名，实际上是当时陆军动员总兵力的65%。

当时，日本本土的配置兵力约为56.5万名，这相当于全部兵力的27%。另外，派往中国南方地区的兵力约为15.5万名（约占总兵力的7%）。从该数字不难看出，向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占了多么高的比例。

这一兵力配置比例，即使在对英美开战以后也没有变化。在1943年美国发起真正的对日反攻以后，从

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中抽出来一部分转到了太平洋战场，为此 1943 年在中国的兵力减少到 128 万名（占总兵力的 44%）。

进而，1944 年，在华兵力为 126 万名（约占总兵力的 31%），南方战场的兵力为 163 万名（约占总兵力 40%）。此时，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所占比率首次开始降低。但是，在日本战败的 1945 年，再次增长到 198 万名（约占总兵力的 31%）。

这也是由于随着战局恶化而强行动员国内兵力的结果，使得绝对兵力数增大。向中国战场投入 198 万兵力这一数目，与同一年和美国作战的南方战场的陆军兵力 164 万名（占总兵力的 26%）相比，超出 34 万。

总之，直到日本战败为止，中国战场的兵力配置一直都占据极大的比重。侵华日军在陷入了泥沼的中国战场，迫不得已地极度消耗着兵力和国力。如此，日本在对中国的战争中岂能说取得了完全胜利？即便是说取得过部分胜利，也绝不是主导战争全局的优

势下进行的。

在长期持续的“没有胜利的战斗”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超出了国力的承受极限，只是一味地拖延、维持现状。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地加剧国力消耗，疲惫殆尽。

以上，主要从对投入中国战场绝对兵力的数量之多，以及对兵力配置比例之大进行了分析。若仅仅是这些，也许会被指责为偏颇的认识观点。接下来，再从投入各战场的军费比率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的《昭和财政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版）第四卷中显示的军费的变化，很有典型意义。引发“中日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的九一八事变是1931年，当年陆军省、海军省的费用和征兵费用等直接军事费共计46129.8万日元，占国家预算（147687.5万日元）的31.2%。

这之后，在中日战争全面开始的1937年，日本的军费开支高达327793.7万日元，占国家预算的比

例也高达 69%。在日美开战的 1941 年，军费已高达 125342.4 万日元，尽管国家预算的规模扩大，但是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仍高达 75.7%。

日本的军费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在甲午战争时（1894 年）为 69.2%，1895 年为 65.5%；日俄战争时（1904 年）为 81.8%，1905 年为 82.3%。虽然有所例外，但即使在平时，军费开支一般也占到国家预算的 25%—40% 这一高比例。

但是，“中日十五年战争”开始以后，国家预算中的军费比例，1937 年为 69%，1938 年为 76.8%，1939 年为 73.4%，1940 年为 72.5%。也就是说，由于中日战争，日本的军费极大地增加。

如此庞大的军事费用，真正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去了吗？根据同一资料，与和美国进行战斗的南方战场比较，来看一下日美战争开始的 1941 年以后的实际军费开支状况。

在对中国战争和对英美战争同时并存的 1941

年，除了满洲地区以外，投入中国战场的军事费用为106200万日元（占全部费用的36%），南方战场为32100万日元（占11%）。

之后，随着与英美战争的激化，自然增大了南方战场的军费开支。但是，仅从占全部军费支出的比例来看，1942年中国战场占32%、南方战场占29%；1943年中国战场占44%、南方战场占34%；1944年中国战场占64%、南方战场占28%；1945年（4—10月）中国战场占54%、南方战场占10%。

自1941年开始到1945年之间投入中国战场的军费总计为4154100万日元（占该期间军费支出的57%），而南方战场合计为1842600万日元（占该期间军费支出的25%）。

从按地域和年度统计的军费支出数字来看，事实上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军费是对英美战争的南方战场费用的2倍以上。很明显，与南方战场相比，中国战场所占的比例之大，投入军费方面的差距甚至超出了

兵力方面的差距。

前述的直接军事费用的情况，毕竟是作为预算列出的数字，并非是完全投入军备的扩充。即使作为军事费用列入预算，储蓄在陆军省内的事例似乎也并不少见。在这一点上，根据按地区支出的实际数字来判断是比较确切的。

在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日十五年战争”中，特别是由于自1931年到1941年大约10年间投入巨大的战争军费致使国力耗竭，而另一方面，军部掌握了扩充军备的机会，由此，自对英美开战以后的一年多南方战场连战连胜，有足够的军备实力来迎击英美攻势。

即便是中日战争为后来的日美战争做了准备，但是对中国战争的投入比例之大仍是极其重大的问题。在此，再次想要强调的是，因对中国的战争迫使国家财政支出巨额军费，结果为日本军部开始对英美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此也使日本财政陷入了濒临崩溃的困境。

向中国战场投入如此大的兵力和巨额军费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最终日本是败给了中国。根据以上的数字分析，能够再次清楚地看到中日之间 15 年的战争在整个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当时日本所处的现实，按照实际财政状况根本不可能承担如此高的战争费用。虽然深知战争必将导致大量财力消耗，带来财政困境，但是日本仍然以国家意志发动了战争，对这一历史教训，如今是否能引起足够的思考和反省呢？

虽然负债严重，但仍然持续和徒劳地投入大量军费，最终走向自我耗尽、自我毁灭，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从实际的战争进展情况来看，1937 年（昭和十二年）12 月虽然攻陷南京，但是在中国政府将首都迁到重庆之后，日本没能够对中国实施最后的打击。

虽然发动了很多大规模战役，但在造成中国方面巨大损失的同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官兵也损失惨重。可以说中日两国应对战争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中

国各地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消耗战。

日本侵略军直到最后也没有取得胜利，而是被动地卷入中国方面的攻势作战中，吞食着事实上的战败苦果。可以说，当时的处境是，面临注定的战败，虽然想要撤军，但已深深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最终陷入了持续损兵折将、加剧国力消耗的困境。

“中日十五年战争”自以柳条沟事件为起因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经卢沟桥事件而发展为全面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主要战力，国力亦疲惫不堪。

在战争之初，中国不堪一击以及压制论弥漫了日本政府和军部，舆论界和媒体也大肆宣扬对中国的战争必胜。在这样的国内舆论形势下发动了侵华战争，陷入了如同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一样的泥沼。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当时采取了对东南亚地区武力进攻的对策，并由此引发了对英美的战争。总之，对英美的战争，可以说是作为中日战争的延伸而启动的。

在对中日战争的胜利感到绝望之时，日本政府和

军部加紧掠夺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资源，不得不采取无限期作战的策略。日本进行长期作战的姿态，必然发展成与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权之争，其结果就是与英美的战争。如果对中国之战如愿取胜的话，或者可以预见胜败结局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对英美的战争了。

侵华战争事实上的失败，是导致对英美战争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就是，在对中国之战的胜利期望消失的时候，日本寻求利用所有的战机，以图延迟战败的到来。

战争的连锁效应

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如果是日本败给了中国的话，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承认战败的事实呢？这是否与战后没有充分阐明对中国战争的实情有关？或者，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对于日本人来说，那种

被害的体验是如此鲜明，是否正是由此对中国的战争记忆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呢？或者假设，是由于中国在战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意识上就对其轻视，而将其抛诸脑后了吗？再进一步地说，是因为对中国战争胜利已成了许多人头脑中冥顽不化的认识吗？可以说理由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可以确切地说，战后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战争无论是胜利也好，失败也好，并不想仔细地去考虑这一问题。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三光”政策所暴露的侵华日军的野蛮暴行长期被尘封的很大原因，可以说也是由于对中国战争实情的关心表现淡漠的缘故。

确实，在东京审判时已经明确了战败的历史事实。应该说战后日本人都有了解事实的机会。但是，正视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这一姿态是极其欠缺的。如前所述，对于投入了巨大军费和兵力的侵华战争表现出视而不见的态度，与此相反，对军费、兵力投入相对较少的英美战争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即使对这些数字统计所表明的事实能够给予理解和认同，但是，东京湾上漂浮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投降签字仪式的照片已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败给美国的鲜明印象和痛切感受实难忘却。

在战后日本人中，不愿意承认败给了中国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无论事实如何，坚决抱定日本没有败给中国的信念。他们认为，虽然对中国战争投入了超过对英美战争的兵力和军费，但日本攻破了中国的主要城市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并且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多次取得了胜利。虽然也承认在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有出乎意料的损失，但是，从战争整体来看，日本绝不是对中国作战的战败者。

抱有这种认识的旧军人，也结合自身的战斗体验，虽然怀有加害中国的自责，但无论如何都极力否认败给中国这一事实。

另一类人是，即使能够理解日本最终是败给了中

国，但是，坚持采取拒不认同的态度。

不过，其中有些人认为，因为最终日本是接受了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而投降的，那是确切的事实，故持有承认对中国“战败”也未尝不可的态度。

在中国战场的一些重大战役取得胜利，并不能表明全部战争的胜利，所以认为是败给了盟国军队。看上去，这种判断本身似乎是合理的。

但是，这里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承认败给了盟国军队，但不承认败给中国，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无论如何，战后日本人不愿意承认对华战争失败，存在许多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为什么战后日本人不愿意承认对华战争战败的历史事实呢？对此，透过战前战后积极活跃的知识分子的言行，或许可以寻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不认为支那击溃了日本”

在战后的日本，以战败的感觉谈论有关对华战争的知识分子是极少的。例如，从明治时期到昭和时期的著名言论家、曾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的德富苏峰，在日本战败第二年的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8月2日，发表了如下讲话。

在他看来，首先，涉及对中国的战争，假定日本战败了的话，那是因为“为世界所憎恨的日本，要击败支那成为亚洲的霸主，对此许多国家决不会坐视不理。至少英、美、苏三国会反对日本，站在支那的立场上是很自然的”（德富苏峰：《终战后日记》，讲谈社2007年版）。在日本决定发起对华战争时，没有料想到与这三个国家的战争，德富苏峰认为是当时政府和国民缺乏预见。

德富得出如下结论：“因此，最终日本受到支那的

牵制，以至进退两难，最终无条件投降。虽说如此，但我们不认为支那击溃了日本。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天助支那来灭亡日本。”

德富不承认日本败给了中国，而认为是由于政府和国民缺少预见，或者是本不希望发生的与美、英、苏的战争而导致了战败。德富对中国战争的这种认识，蕴涵了其一向持有的否定中国论，或者蔑视感。即使没有这些，我认为，这一论点也表现出不能彻底反省日本侵略行径的姿态。

但是，德富的这一观点，确实反映了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所共有的对侵华战争的认识。

总之，在中日两国的战争中，由于英、美、苏三国全都站在了中国一方，从而导致了日本战败；如果是纯粹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的话，应该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对战败的一种强词夺理的辩解。

我认为，这里所表明的认识，也与战后日本人的“脱亚”观有关。与日本同是战败国的德国，根据在欧

洲各国的攻势下投降的战败总结，决心“重返欧洲”，如今成为欧盟的中心国。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由于没有对败给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事实进行总结，无论是在姿态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没有“回归亚洲”的意愿。

日本不反省对亚洲的战争，而是一味地紧随美国，甚至可以说将亚洲不屑一顾地抛在了脑后。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战败后，在舆论界已经表现出日本人崇尚美国和盲目追随的态度。

例如，我手头有《国际检查局扣押文件·战败时全国治安信息》（日本图书中心1994年版）的资料。现将其中第7卷的有关内容引述如下。

这是一份鸟取县警察总部部长给内务省警保局长以及中国地方总监府第一部长的文件，题为《关于针对投降书签字仪式发表后的民心动向》（昭和二十年9月5日）。其中写道：“美国考虑到将来的对苏关系，应该在政治上不会采取太强硬的态度吧。”“就日本科

学的问题，限于美国对武器方面抱有警惕，但在其他方面应该会奖励的吧。”如此等等，记载了美国对日政策的乐观论。

与在英美战争时期所表现出的对美国的认识截然不同，这种易如反掌般的转变令人称奇。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飞机进入日本上空，在全国各地进行狂轰滥炸，并投下原子弹，使日本遭受了巨大破坏和损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对美国既抱有仇视和恐惧感，又充满崇拜和向往，是一种矛盾复杂的感情，而在战后则很容易地转变成了单纯的崇拜和向往。

问题是，这样的认识培植了“败给了美国”这一感情认识。这种感情认识沉积得越深，败给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意识和感情就会变得愈加淡薄。

甚至丸山真男也抱有的意识

下面看一下有关战后日本人对中国认识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言论，其中以战后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言论最值得玩味。丸山在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上作了如下演讲：

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虽然不是恐惧感和生产性的，但是今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发展成为大国，日本必须拼命地努力。也正是为此，动不动就依赖美国和苏联这种“背靠大树好歇凉”的想法不改变的话，无论到何时都会是恶性循环。（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座谈》第7卷，岩波书店1998年版）

在这里可以窥见今日愈加扩大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警戒论”的思想。丸山的这一演讲显然是一种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所以真的很想知道丸山先生对于中日战争持有怎样的认识。也就是说，

既然抱有中国大国化的恐惧感不是生产性的，那么为什么又认为“中国成为大国的话，日本必须要拼命地努力”呢？

丸山真男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演说？如果将此与中日战争联系起来的话，就是由于日本侵略过中国，因为给中国带来巨大牺牲这一历史事实而背负着某种压力，而且由于日本没有认真清算这段历史，丸山真男的意识中似乎潜伏着某种不安。

如果日本清算了侵略中国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不断地努力铺设历史和解道路的话，那么日本即使不“拼命地努力”，依然可能与中国建立互利互惠的关系。

产生恐惧感和警戒感，与其说这是来自对方的态势，不如说是出于自身没有清算过去的历史和不能赢得对方信赖，由此感到的不安和自疑的心态。

所以，为了不用依赖“日本必须拼命地努力”就可以心中坦然，不再愧怍，中日历史和解是面临的紧

要课题。

在丸山演讲中所显示的中国大国论，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带给日本的压力，更加抵消了战后日本人对加害中国的认识，或者加害的记忆。

也就是说，故意地制造舆论，表明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与日本进行战争时的中国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其实是极力弱化自身的加害体验和加害事实，是罔顾历史的自欺欺人的意识的表现。

故意将战前中国和战后中国加以区别，我感到这是无意识中对中国加害意识的逃避。无论如何，日本帝国主义所伤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民，而加害的对象和历史事实不会因该国体制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欠缺的视点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大都

缺乏一种从正面去看待中国的视角，因而客观地看待历史尚做不到，何谈深入、公正？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强词夺理的历史解释依然盛行。这是狭隘的一国主义观在起作用，是排外的国家主义。

解读历史，不是将我们的思维陷入闭塞的观念之中，而是应该汲取过去的教训，找出有益于现在和实现未来的素材。在这方面，特别是战后日本人，在解释中日战争这一点上，狭隘的一国主义历史观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战后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并未从以前的错误认识回到正轨，对中国向来的偏见以及主观的评价仍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章介绍的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所表达的对中国的认识，从敬畏与学习到轻蔑和歧视的转变，其后果在中日战争期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即使在日本战败之后，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在

日本人意识中日渐固化的偏见，甚至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虽说有予以纠正的趋向，但是似乎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进而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明显的“大国化”这一新的形势中，显而易见对中国的观念又揉进了其他因素，也就是说，开始对中国的强大抱有恐惧或警惕，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不可否认，这将有可能成为阻碍加深历史认识以及增进中日历史和解的障碍。

在这里所说的歧视意识并不是仅仅从存有偏见的意义上来讲的。即有些看法并非毫无根据，不必无条件地盛赞中国的抗日战争，其中也必定有许多中国人之间的丑恶争斗以及非人道的行为。

虽然这一类的指责或埋怨的确事出有因，但是中国人民在抗日这一大目标面前团结一心，集合全体人民的力量构筑抗日统一战线，阻止并最终打败了侵华日军，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中日战争是日本所发动的以压制中国为目的的侵

略战争，当然，从中国方面来说就是阻止和反抗侵略的抗日战争，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

由此，中国人民便通过抗日战争愈加团结，而侵入中国的日本士兵，对中日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等抱有怀疑，便逐渐变得厌战情绪渐浓，由此，发生了许多如上所述的军内暴力事件。

在日本士兵中，的确有许多人和部队体验到了在一些具体战斗中的胜利。但是，即使在许多战斗中获胜了，日本最终战败却是历史事实。不想承认战争中败给了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不愿正视中国，或者说，因为有不想面对的创伤。

像这样的日本人，恐怕其内心是百感交集、十分复杂的。战败是谁也无法挽回的事实，必须要接受它。但是，将自己的战争体验全部仅仅作为战败体验铭记和回味，依然难以接受。

总的来说，即使不将痛苦的战争体验加以美化，将自己人生中十分珍贵的一个时期浓缩到战败体验中

也是难以忍受的。那么，各个战斗中的胜利体验，以及通过相信“圣战”这样的战争大义，想要肯定自己的出征体验，这样的心情也是情有可原的。

与美国的战争也同样，不愿以完全的战败来否定那一时期的经历。那时，由于抱有对中国之战“胜利”了这种实际感受，因而能够寻找到一点弥补战败创伤的心理安慰。但是，这是一种虚构的“胜利”体验，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第三个原因是，与中日战争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有关。由于中日之间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战争，在战争状态趋于常态化的情况下，有很多日本人认为中日战争本身不像是战时，而是近乎平时的感觉。

与战地相隔遥远，只是通过报纸等媒体传来的战况以及中国方面的信息，像日常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愈加酝酿了厌战情绪，与此同时，战时和平时的感觉变得模糊不清。

对于战后日本人来说，将与中国的战争划分战时

与平时的界限并不容易，一直是十分模糊的。到迎来了“终战”为止，究竟日本何时与中国开战的，又是怎样结束的战争，并没有清晰而统一的认识。

与美国的战争是因偷袭珍珠港事件引发的。在军舰鸣笛的回响中，“本日拂晓，帝国陆海军在西太平洋进入战斗状态”，听到这一大本营开战速报的日本人，应该有一种接触到战争开始瞬间的实感。

因美国投下两枚原子弹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冲击，以及广播中日本天皇宣布“终战”的声音，这同样也是有切身感受的。与这种鲜明的开战和终战的形式相反，标志着中日战争开始的九一八事变，是在相对久远的1931年9月18日发生的事情。

因为并不是持续处于交战状态，所以很难将从1931年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看做与对英美战争同样的战争。由于长期战争而形成一种“习惯了战争”或无关痛痒的心态，这也是直到战后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极不关心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个原因，也是我最想强调的，这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的战争最初究竟为何引发的问题。如果先说其结论的话，由于是“大义之战”，在日本战败的同时，开始有意无意地将“中日十五年战争”忘掉了。

至少，与明治政府近代化政策同时进行的、为确保对中国的统治权而采取的国家行动，最后是承受了全盘失败这样的历史体验。

战前政府与明治政府内在的暴力和压迫论一脉相承，对内强行对“臣民”进行压制，对外大力推行殖民统治，奴役别的民族。这种状况持续发展，一直凭借着战争这一国家暴力行为。对中国的侵略，可以说是从明治政府开始的病理的发展。战后，我们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等词语来对这样的病理加以批判。

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人民，有关中日战争史和关系史的研究都在证明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在各个领域中总是有人试图忘却或掩盖过

去的历史，不断地对历史事实进行淡化和曲解，甚至干脆否认。

中国从 1945 年到 1949 年之间，陷入了内战状态，这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倒是有利可图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需要面对被害者的问题被搁置起来，确认加害意识的机会如同完全消失了一样。

对于曾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日本人来说，好像加害对象不那么明确了，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而获得了从加害体验中解脱的机会。

反过来，由于广岛和长崎遭受了原子弹袭击，自身拥有强烈的受害体验，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从加害体验中解脱。这也是消除了败给中国这一认识的原因之一。认为日本原本不是对中国的加害者，故也不是“战败者”，这样的认识深植于战后日本人的心中。由此，无法达成败给中国这样的认识。

二、德国和日本

“原子弹是神的保佑”

这句话可以与战后日本人象征战争记忆的、遭受原子弹袭击的体验联系起来考虑。

例如，在广岛和平公园里铭刻着“不再犯第二次过错”这样的话，颇值得玩味。语句表示的“犯过错”，是句模糊的和典型的不确切表述。“过错”是谁的？让人感到这里脱落了主语。

不能确定这种无主语的表现是不是故意所为，并且故意把是什么“过错”也不明说。这里是说侵略战争的“过错”吗？或者还是说日本战败了的“过错”？或者是说投下原子弹的“过错”呢？还是意指整个战争的“过错”？寓意颇费猜测，却又引人思索。

很可能是有意地选用了暧昧的语句。在这样的地方刻下这样的句子，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遭

受原子弹轰炸的遇害者，肯定是由于某种“过错”被残害的。

问题是，“过错”的主体、原因以及对象全都是模糊的，这是不愿意讲述自身要担负的加害责任。这种暧昧的深处也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日本是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而战败的。

美国最终决定投下原子弹，其原因有迫使日本军国主义尽快投降、防备苏联对日本的进攻和占领，以及对日本进行单独占领的考虑。这些已在有关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

另一方面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导致最终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境地，毫无疑问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悲剧。可以说，原子弹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但是对于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残害的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人民来说，同时也包括日本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将日本视为加害者是极其自然的。

在此举一个新加坡的事例。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当时的英属马来亚）落入日本军队手中。在日本的占领政策下，打着“肃正”旗号进行了屠杀。也就是对那些被视为支援中国抗战的住在新加坡的华人和当地人民进行“肃正”，据记载有6万新加坡人遇害。

在位于新加坡圣陶沙岛（Sentosa Island）的战争资料馆里，各种各样的陈列品展示，表明了从占领到解放的历史过程。我去那里参观已是20年前的事情。那是1988年春天，我到圣陶沙岛访问时，专门参观了战争资料馆。在陈列品的最后，有一幅起到装饰作用的巨大的蘑菇云照片，照片中央印有用汉语和日语写的“原子弹是神的保护”。据说现在已经去掉了。

对于新加坡人民来说，只有对日本投下原子弹，自己国家的人民才能从强盗占领以及恐怖的“肃正”中解放出来。“原子弹是神的保护”，正是表明了新加坡人民的这种真情实感。在此所表现的是将日本政府

和日本人视为加害国与加害者。

如果追究投放原子弹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因为遭受原子弹轰炸而仅仅声称被害者的体验，却忘记了自身的加害责任，这样下去只会更加矮化贬低自己。军国主义是导致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根本原因，如同文字表述所形容的一样，日本人用自己的手向自己的身体“投下了原子弹”，我认为，这种形容是极其正确的。

应该与亚洲太平洋战争作为一体考虑的中日战争，其起点毫无疑问是1931年9月18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英美战争是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日十五年战争”的延续，这两场战争虽然展开的地域不同，但实属同一场战争。

承认败给中国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导致投放原子弹的政治判断的问题要受到追究。战后日本人在谈论和承认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的人中，难道有谁将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作为问题焦点来谈论的吗？

的确，投放原子弹是美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的结果，是惨无人道的暴行。在这方面，毫无疑问应该追究决定投放原子弹的美国政府的责任。

但是，为美国投放原子弹提供借口和理由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他们发动的侵略别国的战争。

承认过去的战争首先是败给了中国，继而卷入了对英美的战争，最后导致引发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这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必须正视这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若不如此，“不要重演广岛惨剧，不要重演长崎惨剧”的口号，将不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没有持久的意义。

这一口号，不仅是由于被害体验，同时也作为包含更多的加害体验、加害事实和希望世人从中汲取教训、实现恒久和平的口号，引起了世人的共鸣，铭记在人们心中。

不愿承认败给中国的人们，同时也不愿以真诚的态度看待投放原子弹的真正原因。承认败给中国，马上联系到追问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同时也会追

问导致投放原子弹的根本原因，即所谓“原子弹投放责任”。

将过去的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了亚洲解放的“圣战”的人们，其持有的历史认识中是否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和原子弹投放责任的问题呢？正因为他们从未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不愿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不愿正视败给中国的历史事实。

在亚洲民众的抗日战争和反殖民运动中，日本整体上败给了中国。这是由于明治政府步入歧途所导致的恶果。只有确认这一历史事实，才能够期待深化历史认识，汲取历史教训。

针对日本的历史认识，包括中国、韩国、朝鲜等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和民众，都提出了严厉的责问。

隐瞒和否定历史

不愿承认败给中国，与不愿承认日军所犯下的诸

多战争罪行是同出一辙的。如上所述，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再三提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1937年12月）。围绕该事件有各个方面的争议。

首先，是对有关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持有的异议；其次，是即使承认确属真实事件，也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受害的中国人数量等持有异议（或强调其不可避免，或认为受害者数量被夸大）。在大量事实面前，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持否定论者已经完全站不住脚。有关遇难者人数的统计，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和日本研究者（虽说是研究者，也因站在各种不同的立场上而导致数字差异很大）之间依然有很大差距。

我个人开始着手研究南京事件是在1986年9月访问南京时，当时参观了南京事件纪念资料馆，以及在市内各地屠杀现场建成的纪念碑。

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逃出了南京，据查证，当时南京有警备军约15万名，南京城内外住有约40万—50万名普通市民。

进行南京扫荡作战的中支那方面军，根据“对待捕获的俘虏，可以在当地处决”的命令（南京战史編集委员会编：《南京战史资料集·中島今朝吾日记》，偕行社 1993 年增补改订版）进行扫荡。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按这一方针，实行彻底消灭俘虏、屠杀市民，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事实上，驻扎在南京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有关人员，通过美国和印度的媒体迅速地将事件真相传向国际社会。当时，日本国内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国民是在战后才获悉南京屠杀的事实真相。

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通过各种方式加以隐瞒，因此，有关查明真相的措施和研究十分落后。如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残杀的中国人达 20 万已经开始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与日本陆军有关的偕行社，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要参与南京作战的原出征士兵写手记，编辑发行了《南京战史》（偕行社 1989 年

版)。然而弄巧成拙，其结果适得其反，收集到的许多手记内容揭发并指责了侵华日军的野蛮暴行。

在偕行社的《南京战史》中，提到南京事件受难的中国人为6万—7万人。虽然对日军违反国际法的残忍暴行事实上予以承认，但是过低地估计了受害者人数，对这一重大残暴的犯罪事实试图减轻和遮掩。

缺少充分证明南京事件真相的客观资料，想要过于强调事件的重大程度，对一些没有经过充分查证的资料及证言滥加引用的情况不在少数，也会令人疑惑，由此反而引发了南京事件虚构说的舆论。

诚然，人们必定期待资料本身以及引用是确凿无疑的。但如果因为资料方面的某些瑕疵，或因查证过程中有误，就颠倒黑白地想要否定南京事件的做法，可以说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部分人要如此固执地坚持否认南京事件呢？那是由于南京事件是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从事实上提

供了充分证明，所以必须对其否认或者加以修正。

正如中岛第十六师团长的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无视《日内瓦协定》，对于自我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也不按俘虏待遇，“可以在当地处决”，也就是由现场军人来决定是否杀害。所以，南京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对包括一般市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进行残杀的战争暴行。

关于一般士兵虐杀中国人的事情不仅仅是传闻，参与攻占南京的士兵留下了写实记录，现对其中一部分加以介绍。

《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战中日记》（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大月书店 1996 年版）中，刊载了与南京事件有关的士兵的战中日记。下面引用日期为 1937 年 12 月的几篇日记的摘要。

顺便提一下所谓第十三师团，是属于上海派遣军指挥下的师团，山田支队，是隶属于该师团步兵第一

○三旅团的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基干部队，在攻占南京的战斗中，是极其残暴、有组织地杀害俘虏数量最多的部队。

12月15日

午前9点开始与伍长两个人外出征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拿到一册《唐诗三百首》，已经5点。看到在长江沿岸对俘虏执行枪决，一次处决三四十名。（堀越文男战中日志）

12月16日

警戒愈加严密，尽管如此，午前10点第二中队和卫兵换岗，稍微安心。但是在午饭期间发生火灾，引起极大躁动。午后3点大队决定最后执行，将俘虏的3000名士兵带至长江岸边射杀，在战场上做不到、也是看不到的景象。（宫本省吾战中日记）

12月18日

午前零时，接到了进一步消灭残兵支队的出动命令。轻装上阵，沿途遍地尸体，我们在数不清的敌军的尸体上行进，迎面吹来的风多少带有血腥味，充满了杀气。对长江沿岸捕获的一批俘虏执行枪决。（齐藤次郎战中日记）

将“中日十五年战争”看成是中日两国间的事变或者纷争，而不是战争，因此不受国际法以及国际社会的规则和道德的制约，这种自我判断和认识在南京大屠杀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同时，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教育和宣传一贯地向日本人灌输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歧视情感，这次事件也是长期以来对中国人蔑视情感的一次爆发。

归根结底，承认南京事件，同时也就是承认了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人接受灌输的暴力性和压迫性等，承认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排外民族主义。

南京事件否定论者所惧怕的是，因为这是涉及有可能全部否定战前政府，或者天皇制政府的重大问题。在此想要提示的是，南京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是近代日本政府的本质，南京事件可以说是日本作为国家犯罪的重大事件。

谢罪要到什么时候为止？

在认识中日战争方面，总是缠绕着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谢罪要谢到什么时候为止”的疑问。虽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过去曾被侵略过的各个国家和人民，反复不断地通过言语及行动进行“谢罪”，但是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一定要持续下去吗？这种疑问产生了某种逆反心理。

自从宫泽喜一内阁开始谢罪，到所谓的“村山谈话”为止，持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谢罪。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这些谢罪并没有充分地传达给对方。

为了将谢罪真实地传达给对方，仅仅靠言语和文书有时是极其困难的。在此，感情和实际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所谓感情，就是加害者要能够面对被害者一方，抚平被害者心灵的创伤，使其确信不会再重复受到伤害的经历。所谓实际行动，意味着为了使这种确信和安心永久地持续下去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或者政策。

谢罪者，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政府及其国民，的确到目前为止不断地通过言语、谈话以及文书表示谢罪。即便如此，由于不能够反省过去和承担战争责任，因此也就不能让被害者在感情上认同和接受。

例如，一方面宣称不再成为侵略国家，却又依然参拜军国主义思想再生之源的靖国神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东条英机等战犯合祀在那里，这种不顾中国等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的做法，给被害一方带来不信任和不安。

还有企图修改基于反省侵略战争而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的活动。一边发誓不再保有军队，而事实上却又拥有

即使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名曰“自卫队”的军队；以及可以说成是强制爱国主义的《教育基本法》的改正等。观察一下日本最近的动向，从亚洲各国的角度看，对日本企图再次成为军事大国难免要感到忧虑。

我认为，如果真正地想要从过去的战争中汲取教训，日本就不应该推行上述的一系列政策，不应该高扬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曾多次以德国为对象加以比较，同是战败国的德国，战后努力反省过去，排除对侵略战争的自我肯定，可以说彻底地追究了侵略责任和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这种从实际行动上表现的谢罪体现了深深的诚意。因为德国完全接受这样的现实，那就是若不如此，欧洲各国将不会原谅德国所犯下的暴行。

加之如果德国不能如愿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融入西方阵营的话，那么战后将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鉴于这样的形势，德国向以往被侵略过的国家进行了彻底的谢罪，作出防止再次发生战争的

宣言。

从其背景来看，德国人通过大选合法地承认纳粹党为第一党，纳粹党的党首希特勒发动战争，给欧洲各国造成巨大伤害，德国人必须将此视为自己的责任。由于事实上拥护和助长了纳粹的罪行，其国民已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或者加害责任。

在德国，比起对于一般战争的责任意识，人们对于纳粹罪行的责任意识负疚感更深，正因为如此，这种非常具体的战争认识极其深刻。

战后，德国领导层和人民能够做到反省侵略战争或者战争罪行这一问题，将纳粹的罪责作为自身的问题来对待，勇敢面对历史。因此，德国对过去的战争认识基本表现为既具有作为加害者的自觉意识，同时又怀抱有对受害者进行补偿的真诚感情。

即使在今日，德国依然注意保持彻底的反纳粹思想，在法律方面也有严格限制，以杜绝纳粹思想和军国主义的再生萌芽。

战后德国一直坚持不断地自我揭露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例如，清算以虐杀犹太人为主的纳粹罪行，在西德的联邦补偿法（1956年制定，1966年修订）中制定了支付总额达796亿马克的补偿费，并制定了德国、波兰和解补偿法（1991年制定）等，依据这些法律，一直持续地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

这样的战争补偿，即使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在继续进行。据说补偿总额已累计达1223亿马克（相当于97840亿日元）。

虽说德国从国家整体上对侵略罪行及战争责任进行了谢罪，但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国民之间，围绕战争总结只是同一种意见。事实上，在不断地追究希特勒罪责的同时，企图美化希特勒的功绩或相对减轻希特勒罪责的也大有人在。

在这些人看来，希特勒建设了德国无限速高速公路（Autobahn）等，对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促进了社会福利，为德国社会的近代化作出

了贡献。

此即所谓的“近代化的相对化”，这方面的争议，已经在1980年前后悄然开始了。[沃尔夫冈·韦伯曼（Wolfgang Wippermann）著、增谷英树译：《德国战争责任论争 德国“再”统一和纳粹主义的“过去”》，未来社1999年版]在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即在“殖民地近代化”论中，反复地强调殖民地统治促进了近代化的评价，从而相对地减少对殖民地的加害责任。

在这样的动向中，1986年夏，在德国发生了社会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之间的所谓“历史家争论”。诺尔特提出了对于纳粹的罪责德国人要谢罪到何时为止的疑问，并为许多人所接受。

哈贝马斯则强调战争责任的无时效性，认为如果不坚持追究纳粹的罪责，就是允许纳粹再次复活。最终绝大部分德国人接受了哈贝马斯的主张。总之，对于德国人来说，深感应从正面接受纳粹的罪责，正视

这一问题，加深认识并决心不再重蹈战争覆辙。

也许是作为对过去的战争认识反省的一环，2006年6月，在德国召开世界杯足球赛之际，在纽伦堡的弗兰肯体育场 (Franken Stadion, Nürnberg) 日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赛场，周边有23处设置了展示过去德国犯罪历史的实物。不必说，纽伦堡市曾以判定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而闻名，是审判战犯的法庭所在地。

在该市担任广播宣传的茨厄鲁汉法，在比赛之前谈到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时说：“为了不再给法西斯主义第二次机会，世界杯是向下一代传播历史的绝好机会。”（《中国新闻》2006年4月21日）

与此相比，日本由于在战后与美国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加入了美国阵营，所以不急于通过亚洲外交来修复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在追随美国的情况下，开始了战后的国家重建，并且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从属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架构，使日本减少了与亚洲的接触。

日本一直没能够认识和感受败给中国这一历史事实。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共同声明，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实现邦交正常化更让日本人产生一种对中国的战争责任问题由此终结的错觉。加之在日本追随美国的背景下，日本人自身意识战争责任以及反省过去都变得更为困难。

像这样的战后政治过程，为日本创造了一种不反省战争责任、无视亚洲人民感情的大环境。由此，尽管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强烈反对和抗议，现任首相依然强行公开参拜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再生之源的靖国神社。

面对参拜靖国神社招致的来自亚洲各国的反对和抗议，表现的反应仅仅是“干涉内政”论，以及应坚持“日本固有的文化和传统”这种强词夺理的辩解。所以，有必要对战后日本政治和历史总结的状况，再次返回原点加以梳理和反省。

东京审判和帕尔 (Pall) 审判员

“没有败给中国”这一认识，同时也与否定东京审判将中国作为战胜国、对东京审判持有否定论或无效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有关东京审判否定论的产生背景，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作为裁判管辖权（裁判被告的权利以及范围），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通例的战争犯罪”、“对人道的犯罪”，这些是众所周知的。

所谓“通例的战争犯罪”，是指虐待俘虏、杀害平民、掠夺财物等行为的犯罪，而另外两项犯罪在当时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尚不存在。对此，有人便指责说，这两项犯罪是联合国为了对日本进行审判而任意制定的法律。

从法理上说，的确后来制定的法律追溯过去加以运用，是与“法的不溯及”这一近代法的大原则相违背的。

但是，对事实加以深入整理分析可知，这一论调也犯有根本性的错误。联合国的战争犯罪处罚政策，由于融合了联合国诸国的认识观点，只能是达成基本战略上的一致。对联合国来说，出于反法西斯战争这一共同的目的，在德国战败后的大战末期引入统一的战争犯罪处罚政策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与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并行，1945年6月26日起在伦敦召开了美、英、苏和中国参加的伦敦会议，8月8日缔结了《关于欧洲各轴心国的主要战争犯罪人的追究及处罚协定》（《伦敦协定》）。

由此，在原来的“通例的战争犯罪”的处罚条款上增加了以侵略战争的计划、准备、开始施行等为犯罪的“对和平的犯罪”，以及战前或战争中对平民进行杀害、虐待等非人道行为为犯罪的“对人道的犯罪”，这两种罪行被认定为新的国际法上的犯罪。根据这一框架，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进行审判。

发布《波茨坦公告》是在7月27日，日本最终接受《波茨坦公告》是在8月14日，在此时，“对和平的犯罪”以及“对人道的犯罪”已经制定出来了。

因此，东京审判的审判员中，只有一人主张被告全体无罪，这就是来自印度的帕尔审判员。他指责起诉书违反了“法的不溯及”这一近代法大原则，不能据此判被告犯罪。这是围绕法理问题的辩论，也是关于国际法的合法性的问题。



东京审判

宪法学者横田喜三郎等，在承认事后法适用的纯裁判上的不完备的同时，强调了东京审判是为了防止侵略战争的“国际法上的革命”，主张与其论述是否是原有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在审判终了的今日，进行合理化审判的国内以及国际条件是否成熟。

进而，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意义，横田论述道：“给世界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将对未来人类产生绝对的影响。”（《中央公论》1948年9月号）

在明确这种具有权威性见解的情况下，依然无视《伦敦协定》的存在，对帕尔审判员的意见过度地加以评价是值得质疑的。显而易见，其中所掩饰的真正意图，就是通过阐述东京审判的不正当性，对东京审判所判定的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自我赦免。

即使是帕尔审判员本人，也只不过是依据法理上的观点主张被告无罪，从帕尔留下来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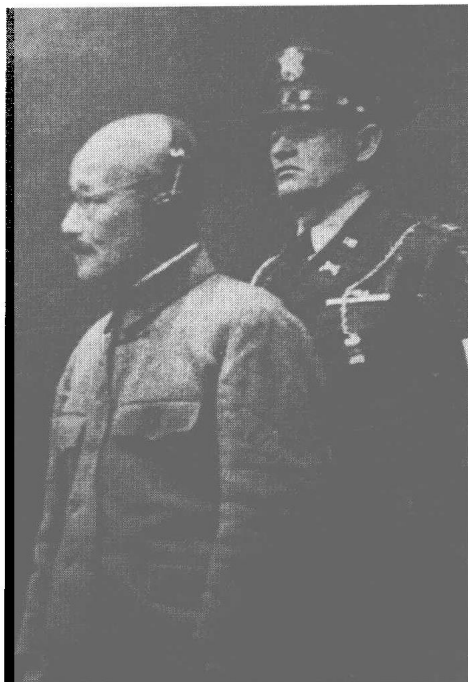
另外，有时可以看到“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东京

审判无效”的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毫无疑问蒋介石代表的中国是同盟国成员，是参与《伦敦协定》审议的一员。另外，中国有各种统计数字表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约有 1500 万人的牺牲者，可以说是在迫使日本走向战败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国家。

在此想看一下另外一个与东京审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东京审判否定论的理由而提出的“合伙共谋”的问题。在东京审判中，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是共谋行为，对此指出了“满洲国”建国（1932 年）这一侵略中国大陆的典型事例。

东京审判否定论者，将日本“进入”中国大陆，看做只不过是为了附和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清朝再建的爱新觉罗·溥仪的强烈愿望，而提供援助。对此，在东京审判开庭之时，美国提出“合伙共谋”罪的建议，在《伦敦协定》中被采纳。

所谓“合伙共谋”罪，就是有关侵略战争以及战争犯罪，“不需要对犯罪全体过程中每个犯罪行为的主



接受审判的东条英机

观要件，只要是参与犯罪的全体计划，仅就此一项即可认定犯罪成立”。

根据历史事实，日本的意图是通过九一八事变开始发动侵略战争。也就是说，让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

的中国东北地区（满洲）独立，在此把握实权以作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压制中国的据点。东京审判将日本这种具体的扩张计划及侵略计划判定为“合伙共谋”罪。

在日本领导层中，虽然不能说共同且一贯地持有彻底的侵略主义和扩张主义，但是至少从193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整体政策上来看，可以确认其行为符合在此所说的“合伙共谋”罪。

在此，对清朝最后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复辟愿望加以政治上利用，即使表面上“满洲国”实行独立，但日本掌握了“满洲国”的实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中国革命胜利后，在记述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时，确实将抗日战争胜利大部分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成果，内容引人注目。其目的是为了向全国人民普及革命思想，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

日本现任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在中国

国内激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尤其是，2003年3月，在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后，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日示威游行，这再次证明了日本政府以及战后日本人对有关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

在靖国神社，东条英机等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合祀在那里。将这些侵略战争的大战犯作为英灵来祭拜这一情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接受和认同的。而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许多日本人对中国反日示威的本意不了解。如此下去，不得不使人感到中日和解之路前途迷茫。

为了打破困局，创造和解和共生的关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应从正面接受过去的战争教训，承认败给了中国这一事实。

若不如此，实现历史和解将是前景渺茫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能够确保相互经济利益的政治解决方式失败的话，我们必须对历史认识的状况进行自我反省，从而向对方显示出充分的诚意，在真正理解和

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来推动历史的和解。

现在，通过重新思考《何谓中日战争？》，希望能够解决战后日本人在历史认识方面有所蒙蔽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坚持推进这一事业，努力开创中日两国历史和解的未来。

通过不断努力加深历史认识，我们才能获得正确地引用历史和以史为鉴的资格。历史认识是对过去事实的把握和反省，同时又是对未来方向的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何谓中日战争？》所探究的不仅是过去的史实，而且是认真地探讨“应该怎样发展今后的中日关系”。通过长期的历史研究，我深切地感到，所谓历史认识就是对未来的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日文文献

笠原十九司：《亚洲中的日本》，大月书店 1994 年版。

田口裕史：《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树花社 1996 年版。

笠原十九司：《历史的事实怎样认定，怎样教授》，教育史料出版会 1997 年版。

赵全胜（杜进、枋内精子译）：《日中关系和日本的政治》，岩波书店 1999 年版。

稻垣武、加地伸行：《日本和中国 永远的误解》，文艺春秋 1999 年版。

Jyosyua A. Fuxoogeru 编（冈田良之译）：《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柏书房 2000 年版。

高浜赞：《日本的“战争责任”是什么？》，Asukii 2000 年版。

饭田进：《没有面孔的国家》，不二出版社 2001 年版。

鹤见俊辅等：《这一百年的课题》，朝日新闻社·朝日选书 2001 年版。

加藤尚武等：《现代日本论》，实践社 2001 年版。

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 2001 年版。

船桥洋一：《现在，如何面对历史问题》，岩波书店 2001 年版。

若规康雄男：《“在中二世”所看到的日中战争》，芙蓉书房 2002 年版。

崔吉城：《“亲日”和“反日”的文化人类学》，明石书店·明石图书 2002 年版。

Edowaado Miraa（泽田博译）：《橘色计划》，新潮社 2002 年版。

二条大河：《日本为什么要战争？》，新风舍 2002 年版。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和日本人》，柏书房 2002 年版。

石平：《为什么中国人恨日本人？》，PHP 研究所 2002 年版。

小野寺利孝等著：《中国河北省的三光作战》，大月书店
2003 年版。

野田正彰：《背后的思考》，Misuzu 书房 2003 年版。

秦郁彦：《昭史 2 年的争点 日本人的常识》，文艺春秋
2003 年版。

东亚学会：《架起日韩友好桥梁的人们》，明石书店 2003
年版。

天儿慧：《与中国如何交往？》，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NHK
BOOK 2003 年版。

佐半藤一利：《昭和史》，平凡社 2004 年版。

高信、鱼住昭：《被蒙骗的责任》，高文研 2004 年版。

星野芳郎：《试问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日本评论社
2004 年版。

小仓纪藏：《超越历史认识》，讲谈社·现代新书 2005 年版。

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岩波书店·岩波现代文库 2005 年版。

熊谷伸一郎：《为什么谈论加害？》，岩波书店·岩波小册子 2005 年版。

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委员会：《开阔未来的历史》，高文研 2005 年版。

VAWW-NET 日本：《被解除的裁判》，凯风社 2005 年版。

小管信子：《战后和解》，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 2005 年版。

保阪正康：《那场战争是怎样的战争？》，新潮社·新潮新书 2005 年版。

黄文雄：《日中战争不是侵略战争》，Wac bunko 2005 年版。

黄文雄：《日本创造了近代中国》，Wac bunko 2005 年版。

谢幼田（坂井臣之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草思社 2006 年版。

进藤荣一、平川均编：《设计东亚共同体》，日本经济评论社 2006 年版。

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编：《理解日中战争读本》，PHP 研究所

2006 年版。

秦郁彦：《歪曲的日本现代史》，PHP 研究所 2006 年版。

荒井信一：《历史和解可能吗？》，岩波书店 2006 年版。

井上寿一：《亚洲主义再考》，筑摩书房·Tikuma 新书
2006 年版。

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検証委员会编：《検証战争责任》（1，
2），中央公论新社 2006 年版。

刘杰等编：《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尝试日中对话》，东
京大学出版会 2006 年版。

东中野修道：《南京事件——解读国民党机密文书》，草思
社 2006 年版。

孙歌等编：《Post（东亚）》，作品社 2006 年版。

永泽道男：《为什么历史认识如此不同？》，光文社 2006
年版。

读卖新闻中国取材班编：《膨胀中国——新国家主义和歪曲
的成长》，中央公论新社 2006 年版。

油井大三郎：《战争观为何冲突？》，岩波书店 2007 年版。

齐藤贵男、森达也：《日本人和战争责任》，高文研 2007 年版。

吉田裕：《亚洲太平洋战争》，岩波书店·岩波新书 2007 年版。

伊香俊哉：《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全面战争》，吉川弘文馆 2007 年版。

佐藤卓已等编：《东亚的终战纪念日》，筑摩书房·Tikuma 新书 2007 年版。

子安宣邦等编：《作为历史共有体的东亚》，藤原书店 2007 年版。

井上寿一：《日中战争下的日本》，讲谈社·讲谈社 Metie 2007 年版。

加藤阳子：《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岩波书店·岩波新书 2007 年版。

赵无眠：《如果日本胜了中国》，文艺春秋 2007 年版。

鹤见俊辅、加加美光行：《超越无根的国家主义——竹内好再考》，日本评论社 2007 年版。

加加美光行：《镜之国的日本和中国》，日本评论社 2007 年版。

中村义：《川柳中的中国》，岩波书店 2007 年版。

田岛英一：《被玩弄的国家主义》，朝日新闻·朝日选书 2007 年版。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论争史》，平凡社·新书 2007 年版。

中文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评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宋强、张藏藏、乔边编：《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6 年版。

郑彭年：《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幡》，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刘志明编：《中日传播与舆论》，EPIC 2001 年版。

高岚：《靖国神社的幽灵：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马黎明编：《当代日本与中国关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隆庚：《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林晓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蒋立峰、林旭：《日本 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王涛：《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吴寄南、陈鸿斌：《中日关系“瓶颈”论》，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

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小军、应竞丽、王华标编：《爱国主义教育概要》，四川

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阎学通、金德湘编：《东亚和平与安全》，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上海广智书局 1904 年版，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版。

后记

我有两位恩师：一位是日本军事研究的开拓者藤原彰先生，藤原先生患病中躺在病床上完成了《饿死的英灵们》的书稿（大月书店 2001 年版）；另一位是引导我对广义上的军事问题产生兴趣的作家五味川纯平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位恩师对工作的执著精神，支持我完成了本书的撰写。

藤原先生在中日战争期间作为中尉带兵参与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并在战争中负伤。复员后，他从事军事史研究，着重探讨中日战争的本质。藤原先生根据战场上的个人体验，并通过丰富的资料调查以及现场

考察，在撰写的诸多著作中，论述了对中国战争对于近代日本来说是极为愚蠢、强行投入的侵略战争，是彻底消耗了日本国力的总体战、损国伤民的消耗战。

五味川先生在中日战争期间也曾就任于满铁经营的昭和炼钢厂，切身体验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蛮横鲁莽和惨重后果，为此撰写了《人的条件》、《战争和人》、《虚构的大义》等作品。

在五味川先生所著的诸多著作中，我再次重读了《极限状态的人》（三一书房 1973 年版）一书，该书的第二部“精神癌症——日本人和对华战争”由评论以及与桥川文三氏等人的谈话构成，字里行间抒发着作者的内心感受，我在本书撰写中也抱有同感。

五味川先生写道：“正如常说的，对华战争无计划地开始，进而扩大，最终败北。在国民的意识中，也许认为最终是败给了英美，绝不是败给中国的这一认定的看法是不会丢弃的。”

五味川先生认为，存在于日本人意识中的“绝不

是败给了中国”这一确信不疑的感情，其背景中具有对中国缺少“敌”的意识。也就是说，长久养成的对落后中国的蔑视感，或者说歧视意识，在表现对中国和中国人憎恨之前，对中国的怜悯感以至没有萌生“敌”的意识。

这里所说的缺少“敌”的意识，产生了南京事件以及“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这种残暴的杀戮行为。在本书中所阐述的不愿接受“败给了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战后对中国以及亚洲的认识。

在另外一段中，五味川先生写道：“日本就是败给了中国，正因在中国大陆失败，由此也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如果日本国民能抱有这样的事实和实感来认识过去那场战争的话，那么我们战后的政治思想运动状况将一定会与现在有极大的不同。”

对“日本败给了谁”这一问题，如果简单地解答为“败给了美国”，而对更深刻的原因加以回避，那么

这等同于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因为那只是封杀历史的行为。

解除封杀的历史，从被掩埋的历史事实中重新吸取教训，进而努力地运用好历史，若不如此，今后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同亚洲诸国的历史和解将是极为困难的。

2007年9月17日，我第二次访问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当天，正值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天。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

我与许多来参观的中国人一起观看图片资料说明，心中不禁思索，中国人将以怎样的心情来面对 76 年前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呢？

结束参观返回入口时，在入口的左面墙壁上有数行大字，书法苍坚有力，格外醒目。因为接下来有预定的安排，我就匆忙地将以历史认识为题的内容拍了下来，是以下的 4 句话：

人们不能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

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

人们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人们更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就将失去明天。

近年我多次去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访问，与东亚诸国的研究者及学生们的持续交流也是我

撰写本书的一大动机。另外，我指导的一些来自东亚诸国的留学生，通过日常与他们的交流，也得到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丰富了写作素材。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

追记

2008年4月，正值春假，我偕家人去大连，再次顺便参观了旅顺资料馆，意外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我和家人并排参观资料馆的陈列品，从后面进来一个中国人参观团体，有的冲着我们气势汹汹地问：“为什么这里会有日本人！”

从那说话的方式和态度表露了受害者内心的情感。一时间充满了紧张、沉重、郁闷的气氛。当时我忍不住想回答说：“正因为我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所以才来到这里，想在战争现场重新认识历史。”正在这时，馆员和陪同我们的中国人为打

破这异常紧张的气氛，马上走到我们中间说：“这里的展览不单单是为中国人的，也是为日本人不忘记历史而设立的。”

也许是接受了馆员的解释劝说，我望着退去的参观团体的背影，禁不住再次深深感到，通过中国人，我不仅确认记忆了被害的事实，加害者也有必要在同一现场接触领悟加害事实。

无论是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只要将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事实铭刻心中，我相信两国历史和解的大门必将会慢慢地打开。

纈纈厚

2008年12月